

172113

批駁右派分子在教育方面的謬論

102

11

新知識出版社

批駁右派分子在教育方面的謬論

新知識出版社編輯、出版

(上海湖南路9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5號

大眾文化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3 1/2 字數：73,000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1—9,900本

統一書號：7076·326

定 價：(6)0.30元

編者的話

本書所集文章，选自全国各地的教育刊物，其中个别文章并經原作者加以补充和修改。

本書包括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在教育方針、党对教育事业的領導、党在教育工作中的干部路綫、学校教育中貫徹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劳动教育以及学习苏联等方面批駁右派分子的謬論的文章。第二部分是批駁个别右派分子的文章。

为了給讀者一个明确的指导，我們將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陆定一同志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中央教育部董純才副部長的文章，分別編入第一、二兩部分，作为全書的核心。

編者企图通过兩部分的内容，对右派分子在教育方面所散播的毒草，作一次全面的、彻底的批駁，从而进一步辨别大是大非，促进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飞跃发展。但是由于篇幅所限，未能更广泛地列入批駁右派分子的文章，其中缺点，在所难免，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編者 1958年3月

目 录

我們同資产階級右派的根本分歧……………陸定一(1)

決不容許动摇党对教育事业的領導……………楚 欽(13)

✓在干部政策上批駁右派……………立 無(22)

坚持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針，粉碎右派分子的謬言
……………文 濛(28)

駁斥陈友松对馬克思列寧主义教育学的誣蔑…顧明远(36)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知識分子的道路……………易 明(43)

反对右派分子破坏我們学校的劳动教育……………蔣怀諒(69)

关于教师負担問題……………周 正(76)

* * *

駁斥林汉达的反党謬論……………董純才(82)

俞子夷的政治立場和教育思想是一貫反动的…祝美乐(83)

“插手”記……………孫家琮(98)

彻底击垮了以顧則夫为首的反动小集团……………王玉明(104)

我們同資產階級右派的根本分歧

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代表在人代會上的發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來總理、李先念、薄一波副總理、董必武院長、張鼎丞檢察長、彭真副委員長、烏蘭夫副總理和周恩來總理兼外交部長的報告。

過去的一年，在我國歷史上是偉大轉變的一年。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在我國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個革命是用和平的方法實現的。我國經過了這樣一個深刻的革命，却在經濟上 and 社會秩序方面沒有發生波動，這是一個很大的成功。原來預期要十幾年才能完成的社會主義革命，七年就基本完成了。這對於人民政權的鞏固，對於我國經濟和文化建設的今後發展，都是極其有利的。

過去的一年，我國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有了空前的發展。就工農業生產的總產值來說，第一個五年計劃實際上已經四年完成。這是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的大勝利。

過去的一年，我們戰勝了數十年來未有的大災荒。這種大災荒，在舊社會里會引起大量的死亡，會使災區農業生產多年不能恢復正常狀態。我們卻避免了這種情況的發生。

以上這些，我們都做到了，但是我們還不滿足。我們清醒地看到，雖然有了這樣大的成績，但是工作中還有錯誤和缺

点，还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必須消除这些錯誤和缺点，以便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動員國內國外一切积极因素，使社会主义建設得到更为順利的进展。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这些政策，从去年起已經陸續提出。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把这些政策作了系統的說明。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报告，詳細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透彻地說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各項政策。今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整风运动。

以上所說的經過情形，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要再說一遍，因为有些右派分子在胡說八道。他們說，共产党到处是錯誤，天下是漆黑一团，他們說，中国共产党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因此非整风不可，而且非下台不可。

共产党的此次整风运动，是在取得了大胜利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毛主席在他的报告里提出的各項政策，包括大家所熟悉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等政策在內，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的条件之下提出来的。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尚未取得胜利，就不可能系統地明确地提出这些政策。正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取得革命胜利的斗争过程中，各民主党派和民族資產阶级及其知識分子一般地是接受或贊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再加上其他因素，所以中国共产党明确地提出了这些政策。同时，今年又决定在党内进行整风运动。

可以看到，人們对整风运动和对党的政策，有兩種不同的态度。絕大多數的人，是站在爱国家、爱社会主义的立場上，来

了解整風运动和党的政策的。他們真心善意地帮助共产党，要加強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團結，要把国家建設得更好。只有极少数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却以为鴻鵠將至，天要变了，可以向社会主义、向人民民主制度、向共产党大举进攻了。

趁着共产党整風的机会，資產階級右派混在真心善意帮助共产党整風的人羣之中，趁火打劫，混水摸魚，进行他們蓄謀已久的政治活动。他們积极散布反社会主义的謬論。他們企图首先夺取民主党派、教育界、文艺界、新聞界、科学技術界、工商界、司法界的領導权，然后进一步夺取全国的領導权。他們企图鼓动学生鬧風潮，并且作出估計，說学生問題一触即发。他們以为，学生一上街，右派分子一到基层去点火，工人職員就会跟着学生鬧事，右派就可以出来“收拾殘局”。这是六月六日章伯鈞和六教授談話时做出的估計。值得注意的是，这六教授中，有高等教育部副部長曾昭掄在內，他就是向章伯鈞獻計，說什么学生問題一触即发的。一个高等教育部的副部長，唯恐学校不亂，究竟居心何在？我們不能不問。

現在，事情已經明白，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过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計了工农羣众的覺悟程度和知識分子的覺悟程度，过低地估計了工商界的覺悟程度，也过低地估計了各民主党派中多数干部和成員的覺悟程度。右派首先在工人那里碰了壁，工人把到工厂里去活动的右派分子赶了出来。右派在农民和城市居民那里也碰了壁，他們反对右派的反动行为。右派把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但他們在高等学校里尤其重只得到大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的学生的支持和盲从，随后盲从的人也紛紛覺悟过来，現在只剩下零零星星的几个人了。

右派把希望寄托在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上，他们提出了什么“保护科学家”，什么“教授治校”之类的蛊惑性的口号，施用了吹、拍、骗的手段，但是他们仅仅能够得到百分之几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支持和盲从，现在，这些人的大部分也正在离开他们。右派在工商界中仅仅得到寥寥落落的几声响应，却出乎他们意料地遭到大多数工商界人士的反对。右派在民主党派中也是很不如意的，现在许多民主党派决定要整风，并且已经起来反对右派分子。这个时期，全国人民上了一堂政治课，大大地提高了政治觉悟，而右派则被完全孤立起来了。

右派煽惑说：肃反运动“糟糕透顶”，思想改造运动完全错了。

现在看得很明白，幸亏我们做了肃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否则，这次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恐吓信和炸弹案是会多得多的，社会秩序是会乱一些的。文艺界如果没有进行过反对反革命分子胡风的斗争，这次就会更乱一些。我们的知识分子和工商界所以只有很少人附和右派，不能不说是思想改造运动的成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肃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不是孤立的东西，而是周总理所说的五大运动、三大改造的组成部分。我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可以有三条道路。一条是，用和平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一条是，以强力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还有一条是，反革命依靠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力量，实现复辟。这

三條道路之中，那一條道路對工人階級、對全國人民最為有利呢？當然是和平革命最為有利。我們在憲法總綱中，已經把和平革命這條道路確定下來。為要和平地實現社會主義革命，不進行五大運動和三大改造，可以不可以呢？顯然是不可以的。如果不進行五大運動和三大改造，就不能逐步消滅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就是等待反革命來進行復辟。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要求實現社會主義革命，而且用和平的方法來實現；資產階級右派則反對社會主義革命，要想對已經基本完成的社會主義革命來一個倒算，來一個翻案。我們全國人民同右派之間的根本分歧，就在這裡。

我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應該起來保衛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不許右派翻案，不許右派倒算。

我們同資產階級右派的第二個根本分歧，是對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看法問題，是對工人階級政党和資產階級政党的看法問題，也就是中國革命應該由那個階級來領導的問題。

右派認為，資產階級比起工人階級來，資本家比起工人來，決不是更差一些，而且還似乎是更好一些。斯大林說“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意思是勉勵共產黨員，要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要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這有什麼不好呢？右派分子章乃器反對斯大林的這個說法。章乃器的意思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並不比資本主義思想高明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工人階級的思想並不比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思想高明些。既然如此，那末，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就是錯誤的。憲法第一條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右派說：工人階

級領導就是“溝”和“牆”的來源。因此，工人階級的政黨共產黨不應當領導國家，如果領導國家，那就是“黨天下”。因此，就應當反對“黨天下”，實行“輪流執政”，實行“兩黨制”，搞“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等等。

憲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儲安平都是人大代表，都投過票贊成憲法。可是他們背信棄義，要來反對憲法第一條。這難道不是根本分歧么？

我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憲法里確定，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而不是資產階級領導的國家，這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根據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多年的革命經驗規定下來的。一百多年來的歷史經驗，證明我國只有兩條路，或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或者是新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中國。中間的道路——資本主義的中國，是不可能的。中國的革命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才能成功，資產階級不能領導中國的革命。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如果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尚且不能實現，何況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還能設想么？

翻開我國的歷史，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戊戌政變、義和團、辛亥革命，都遭到了失敗。直到十月革命後，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我國的先進人物才覺悟到，中國的革命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才能勝利，因而組織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以後，中國革命展開了嶄新的一頁。聯共與反共成為革命與反革命的分界綫。所有的反動派沒有不反共的，所有的革命派沒有不聯共的。孫中山先生制定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革命事業就興旺起來。蔣介石背叛孫中山、反共剿共，革命事

业就被断送，日本帝国主义就敢于来并吞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就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以后，蒋介石再次进行反共的内战，我国几乎变成美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幸而人民的力量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壮大，所以我们能够推翻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统治，把我国从危急存亡的险境里挽救出来。中国人民在三翻四复的经验中，已经懂得：反共，这就是卖国，就是亡国，就是民族的大灾难。中国人民把自己的长期的经验总结为一句话，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并且把工人阶级的领导写到宪法里面去。右派的所谓反对“党天下”，不是别的，就是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等反革命论调的翻版。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等，在开始叛变民主革命的时候，都说他们自己是革命的，决不会做反革命，他们仅仅反对共产党而已。资产阶级右派说，他们自己是拥护社会主义的，是好心好意的，他们仅仅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而已。两者之间，手法完全相同。

我们同右派的根本分歧，也在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看法的问题上表现出来。

究竟是无产阶级民主制更加民主些？还是资产阶级民主制更加民主些呢？我们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是“狭窄的，残缺的，虚伪的，假仁假义的，对于富人是天堂，对于穷人和被剥削者是陷阱是骗局的民主制”；无产阶级民主制，是“为绝大多数民众、为被剥削的劳动者所享受，并发展到空前未有的地步的民主制。”（以上引语都见列宁著“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书）右派与此相反，他们要求什么“绝对民主”，他们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就是这种“绝对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制比无

产階級民主制还要民主。

我国資產階級只有几百万人，資產階級民主充其量只是几百万人的民主。劳动人民有几万万人，无产阶级民主就是几万万人的民主。只看看这一点，就知道无产阶级民主制比起資產階級民主制来，要更为民主得几百倍。历史上，我国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几次国会选举，包括蒋介石的国民大会的选举在内，都是贿赂公行。資產階級民主制在我国老早已经破产，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羡慕的地方。现在，我国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下，不仅劳动者有公民权，民族資產階級分子也享有公民权。世界上没有一个資本主义国家能有象我們这样的广泛的民主。

无产阶级民主制，是所有的政治制度中最民主的一种。它只对极少数的人实行專政。資產階級民主制，却是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專政。比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还要民主的制度，那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会有，因为那时就不需要專政了。可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專政的对象沒有了，政权也就不存在了。那时候还有民主問題，但已經不是“民主与專政”这个范畴里的民主，而只有“民主与集中”这个范畴里的民主了。主張“絕對民主”的先生們，你們的所謂“絕對民主”，是意味着不要專政么？一切政权都是階級对階級的專政，社会主义国家必須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实行專政，否则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存在。你們的意思是不要集中么？人类社会永远需要集中。沒有集中，就犹如沒有民主一样，人类社会的存在不能設想。所謂“絕對民主”，只是反动的幻想，現在不会有，將來永远也不会有。

依照右派的主張行事，既不对反革命分子实行專政，又不

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我們的国家就毫无疑问一定灭亡。

右派的目的，是用所謂“绝对民主”的口号，来迷惑羣众，造成天下大乱的局势，以便反动分子可以乘机大肆活动，进行反革命的复辟，建立反革命的專政。

我們同右派的另一个根本分歧，是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态度。

宪法序言說：“我国同偉大的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各人民民主国家已經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誼……这种友誼將繼續发展和巩固”。

應該发展和巩固中苏友誼呢？还是應該削弱和破坏中苏友誼呢？宪法明明写着“繼續发展和巩固。”

联合苏联，这不但是共产党的主張，孙中山先生也老早提出了这样的主張。孙先生的致苏联遺書，現在我們讀起来还非常感动。联合苏联还是反对苏联，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

中苏团结是世界和平的主要支柱，是整个人类的最大利益所在。没有中苏兩国的巩固团结，世界和平就沒有可靠的保證，人类就可能受到极大的灾难。所以我們主張无微不至地爱护这个团结。

右派同我們不一样，他們用反动的民族主义思想来煽动羣众，要挑起中苏之間的不和。他們的言論，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和蔣介石的論調的翻版，就是要把苏联說成是“赤色帝国主义”，而不是以平等待我的民族。

資产階級民族主义有三种。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这是革命的，我們贊助这种革命的民族主义。有中立主义的民

族主义,这种中立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出现,它的主要作用也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是我们所同情的;在社会主义世界里出现,就有不同的作用,是我们所不同情的。有反苏的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这些是反动的民族主义,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右派的反苏活动,在我国是违反宪法的,是不容许的。

综合以上所说,可以看见,我们同右派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不要社会主义,不要工人阶级领导,不要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不要联合苏联,那就只能亡国。右派的主张,就是要我们亡国,就是要我们人头落地。

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在这些根本问题上进行斗争,已经有多年的历史。一九五三年,就有人发表所谓“工人与农民的生活,是九天九地之差”的谬论,来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从此以后,我们同右派年年有斗争,事事有斗争,不过规模不象今天这样大罢了。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过了几十年的长期反复的斗争。人民对于谁是敌人,敌人的斗争方法是怎样的,我们要达到什么目的,和如何达到目的,知道得很清楚。社会主义革命是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为深刻的革命,它影响到六万万人每个人的生活。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到现在只有八年,从一九五三年宣布总路线算起,只有四年。时间很短,社会主义革命却在锣鼓和欢呼的声音中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人人要过的,但是我们只在经济上过了关,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许多人尚未过关。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中,有许多人,对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是很熱心的，願意為之堅決奮鬥的，但是對於社會主義革命，雖然願意接受，却並不那樣熱心了，並不那樣願意為之堅決奮鬥了。這就使得右派覺得他們的思想還有市場，於是他們敢於翹起尾巴，猖狂進攻。

我國已經是社會主義國家，剝削階級已經基本消滅，大規模的羣眾性的階級鬥爭的時期已經過去。但這決不是說，社會主義社會里就沒有階級鬥爭了。社會主義社會，是到共產主義社會去的一個過渡時期，在這個很長的過渡時期中，剝削階級的殘余及其影響只能逐步消滅。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階級鬥爭還是會繼續着，甚至還出現過象匈牙利事件那樣嚴重的鬥爭，至於國際範圍內同帝國主義的鬥爭，那就更不用說了。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基本完成但還沒有完全完成，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已經鞏固但還沒有完全鞏固。我國國內還有台灣沒有解放，還有為數不多的反革命分子，還有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殘余，國外還有以美國帝國主義為首的侵略集團，時時刻刻企圖顛覆我國的人民政權。在人民內部，有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至於工人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之間的鬥爭，更會長期存在。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和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願意接受社會主義，但是少數右派分子卻反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他們決不甘心放棄剝削，他們夢想走資本主義的道路，他們要為此作最後的掙扎。這些右派分子是不可輕視的，他們有財產，有知識，有一定的管理和組織的能力，同國內外反動派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有進行政治鬥爭甚至武裝鬥爭的經驗。所以，我國還會有長期的階級鬥爭，而且這個鬥爭有時會採取很尖銳的形式，這是肯定了的。

如果以为剝削階級既然已經基本消滅，大規模的羣眾性的階級鬥爭的時期已經結束，因而我國就沒有階級鬥爭了，那就錯了。

此次右派的猖狂進攻，告訴我們：思想改造工作，過去雖然有粗糙的地方，但是整個說來，不是做多了，而是還做得不夠，還做得不很好。許多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人士，要在思想上政治上過社會主義這一關，還需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我們只是在基本上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人們的思想上以及其他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還遠遠地沒有完成，我們還必須繼續努力在一切方面完成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

我們培養了一批政治教師，這是一個成績。政治教師的絕大部分，在這次右派的猖狂進攻中，能夠站穩立場，這是可喜的。政治教育過去有脫離實際的缺點，經過了這次實際鬥爭，這種缺點就有改正的希望了。社會主義的教育同資本主義的教育不同，社會主義的教育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為自己的靈魂，離開了它，就不是社會主義的教育了。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須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學生的實際思想情況結合起來。這是一件極其重要的工作，又是一件難做的工作。各級教育部門和學校教師要同政治教師在一起，把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做好。輕視思想教育和政治教師，是完全錯誤的。

共產黨的整風運動，也是對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都是資產階級的東西。任何資產階級政黨決不願意號召別人來揭露自己的錯誤。這件事只有工人

階級的政黨才敢做。只有工人階級政黨，才能反對和除清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

整風運動開始以來，黨外人士對共產黨對人民政府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這些意見受到共產黨、人民政府的歡迎。這些意見中有一部分帶有片面性和偏激情緒，但仍然是有益的意見，是同右派的謬論根本不同的。我們必須仔細分別香花與毒草。我們的政策，依然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放手發動批評和自我批評，來改正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我們所要長期堅持下去的工作方針。我們應當看到，我們正在做着前人沒有做過的偉大事業，雖然成績很大，但錯誤和缺點必不可免。我們一時一刻也不要驕傲。我們應當揭露和改正工作中的一切錯誤和缺點，使我們的祖國更快地繁榮起來，富強起來。我們的無數先烈，為了這個目的，不惜粉身碎骨。想起他們，我們就感動得流淚。我們有什麼理由，隱瞞自己的缺點錯誤，不肯改正自己的缺點錯誤呢？右派必須無情批判，整風運動必須堅決繼續進行。

決不容許動搖黨對教育事業的領導

楚 欽

右派分子對黨對教育事業的領導的攻擊是毫不放鬆的。他們說：“黨不應該領導教育事業，要實行民主治校”，“黨不能領導教育事業，共產黨把學校辦糟了。”甚至有的右派分子竟猖狂得不可一世，公開“宣布”撤換黨員校長、撤換团支部書記、撤換工會主席等，無遺地暴露了他們企圖篡奪教育事業領

导权的野心。为了保卫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我们必须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党应该领导教育事业

与右派分子的看法完全相反，我们认为：党应该领导教育事业。教育是一种上层建筑，是为政治经济服务的；在阶级社会里，教育永远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永远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我们从不讳言社会主义教育必须以工人阶级思想作指导，必须成为捍卫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阶级斗争武器。作为这样一种武器的社会主义教育，为什么不应该让它在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掌握下，发挥其巨大作用呢？武器总是被人用的，工人阶级的政党不用，其他阶级的政党就要用。如果共产党放弃了对教育事业的领导，那就会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汉阳一中事件就是一个教训，它告诉了我们：和其他战线一样，学校里也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党的领导的任何削弱，都会使资本主义在学校中复辟，都会给反革命叛乱以可乘之机。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曾指出：“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个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全体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这句话虽然是对文学事业说的，但是也完全适用于教育事业。社会主义是个大机器，这个机器只有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才能开动。那么作为这个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教育事业，必然应该由共产党领导，就是天经地义的了。我们的党一贯都是重视对教育事业的领导的；这种领导现在以至今后，不仅不能有任何削弱，而且还要加强。

党能够领导教育事业

与右派分子的看法完全相反，我們認為：党能够领导教育事业。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与提高的根本保证。没有党的领导，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教育。

党能不能领导教育事业，历史是最公正的证人。右派分子睁开眼睛看看我们的成绩吧，事实会无情地粉碎可耻的谎言！旧社会的情景人们是记忆犹新的：以教育来说，性质上是反动的封建的法西斯的教育，数量上也极其微弱，根本不能适应新中国建设事业的需要。党根据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和苏联先进的教育经验，对旧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根本改造，使教育性质得到了根本的改变，确立了新中国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同时，随着生产的逐步发展，党大力地发展了教育事业。我們用不着列举那些史诗般的数字，就可充分证实这一点。试问，现在乡乡有小学，村村有民校，县县有中学，这是旧社会能有的吗？现在可以逐步做到人人能识字、个个能读书，工农子女也有了上中学、上大学的机会，这是旧社会能有的吗？现在有不少祖祖辈辈不識字的工人、农民结束了文盲的命运，能够读书、写字了，这是旧社会能有的吗？……从教育质量方面来说，尽管还远没有达到我們所理想的程度，但仍然是旧社会所无法相比的。旧社会学校培养出来的是统治者、奴才、文弱书生，道德品质不好，身体健康不良，所学得的知識也是“死”的，不能用于实际。我們现在培养出来的是社会主义的新人，也就是有共产主义觉悟的、身体健康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他们品行好、身体好、学业好，体力与腦力得到了全面发展，在学校里一

面讀書一面勞動，離開學校後能夠把學得的知識用來為生產服務。要說質量，這就是一種真正的、全面的、了不起的質量。總之，在對舊教育進行根本改造的基礎上，社會主義教育在數量上有了蓬勃的發展，在質量上有了很大的提高；許多從前被人目為夢幻的，而今卻成了千真萬確的現實。所有這一切，不是雄辯地說明了共產黨能夠領導教育事業而且領導得很好嗎？

劉少奇同志在八大政治報告中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量，在於它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武器，有正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有丰富的鬥爭經驗和工作經驗，善於把全國人民的智慧集中起來，並且把這種智慧表現為統一的意志和有紀律的行動。”這就是黨的領導力量的根本所在，也是黨能夠領導教育事業以至一切的根本理由。事實證明：黨能夠領導軍事，黨能夠領導政治，黨能夠領導經濟，黨能夠領導科學文化，黨能夠領導一切；但是右派分子卻叫囂黨不能領導教育事業，這不分明是胡說八道嗎？

其實，對於黨能夠領導教育事業，右派分子並不是全然無知的；其所以叫喊黨不能領導教育事業，是有其陰謀的。這陰謀便是企圖取共產黨之領導而代之。“黨不能領導××”只是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一個幌子罷了。

折斷形形色色的毒箭

右派分子為了篡奪教育的領導權，還放出了各種各樣的毒箭，我們必須一一折斷它。

(一)叫囂“外行不能領導內行”

右派分子說：“共产党領導教育事業，是外行領導內行。共产党應該趕快下馬。”他們竟把自己扮成“內行”，把共产党說成“外行”，這真是恬不知恥！世界上究竟有多少行？俗話說“三百六十行”，實際上恐怕還不止；但總起來不外兩大行：一行是社会主义，一行是資本主义。我們今天的中國只有也只能有社会主义這一行；建設社会主义，這是各行各業的前提和目標。辦教育必須是社会主义教育，而不是別的什麼性質的教育。根據這一標準，那麼究竟誰是內行，誰是外行呢？很显然，辦社会主义教育，共产党是真正的內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是徹底的外行。

毛主席早就指出過：領導就是出主意、用幹部兩件事。就教育事業說，黨的領導主要體現在政治上、思想上、方針政策上、事業規劃和人事安排等方面。①在政治思想和方針政策上，黨保證了教育事業的社会主义方向。在為誰服務、培養什麼人的根本問題上，黨一直有明確的指示。早在1949年全國人民政協制訂共同綱領時，黨就提出：“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應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材、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主要任務。”同年12月提出了教育為工農服務、為生產建設服務的方針；1951年提出了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1953年提出了整頓鞏固、重點發展、提高質量、穩步前進的方針；總路綫公布後，進一步明確了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要求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學生，加強了勞動教育；1956年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及時提出了全面規劃加強領導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針；去年毛主席、周總理更明確地指出：今后的教育方針是培養有社会

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并强调了加强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同时，几年来党对教育工作者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使他们真正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无愧于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②在事业规划上，党根据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按照需要与可能的原则，制定了教育事业的计划，提出了具体任务和完成任务的具体措施，将各类教育事业纳入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轨道。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如果没有党的“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是不可想象的。③在人事安排上，党坚持了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组织力量来办好教育事业。党一方面抽调了大批党员干部到学校工作，一方面在学校里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并通过学校中的党员团结了广大的教师，发挥了他们的积极性，保证了方针政策的贯彻和事业计划的完成。上述这些，是党领导教育事业的几个主要方面，它有力地说明了党领导教育事业不是“外行”，而是“内行”。至于许多具体业务工作，则主要由教师（包括党内、党外教师）负责。右派分子故意“忘记”了这些，说什么：“共产党不会教数理化，也不会教文史地，就不能领导。”这是有意把党在政治思想、方针政策等方面的领导和具体业务工作混同起来，企图借此要挟共产党“下马”。我们说，领导只能是领导，不可能代替具体业务工作；社会上有各行各业，每一行、每一业中又可分为无数种具体工作。要求对每一种具体工作都精通才能领导，那世界上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个如此“万能”的政党。今天不可能有，将来也不可能有的。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有些党员领导干部目前还不太熟悉

教育工作业务，但党一直要求与教导自己的党员进行艰苦的学习来学会自己不懂得的事情。事实上，不少党员领导干部已经这样作了，并且由外行变成了内行；也有不少一直在学校工作的党员领导干部，他们是熟悉业务的；那些尚未熟悉业务的党员领导干部也一定会按照党的意志去作，虚心学习，不安于做外行的。面对这些事实，我们只能说：对于教育事业，党过去领导得很好，将来会领导得更好，怎么能得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荒谬结论呢？

(二)有意歪曲党政关系

右派分子说：“有文教局就行了，何必要文教部？”“文教局是有职无权。”这些谬论，与全国右派分子所叫嚣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同出一辙的。斯大林同志也曾严肃地指出，不能把党看成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物。这就是说，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应该领导一切，当然也应该领导政府。右派分子说不要文教部，只要文教局就行了，这不仅是想把我们的党变成政府部门的“附属物”，而且是想抽掉共产党的领导，挖无产阶级专政的墙脚。实际上我们从来也不曾混淆过党政关系，那就是党领导政；而右派分子却故意制造“党政不分”的谬论来攻击党对政的领导，攻击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地位，也就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至于说：“文教局有职无权”，更是一派胡言。文教局有它一定的“职”，也有它应有的“权”。这“权”便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它在无产阶级专政中所应完成的一部分任务。因为，党固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但党不直接实现这种专政。专政是国家机关的事情，

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事情。黨的作用是對國家機關進行政治上、思想上的領導，對羣眾進行說服教育工作。

(三) 攻擊幹部政策

攻擊黨的幹部政策，是右派分子企圖篡奪教育事業領導權所放出的毒箭之一。他們詆蔑黨的幹部政策是“用人唯親，用人唯黨。”“入了黨就拿了當校長的定錢。”“只用奴才，不用人材。”“率土之濱，莫非黨員。”黨的方針、政策是需要人去貫徹執行的，但人不是機器。機器掌握在誰手里為誰服務，人的一舉一動都受着思想的支配。在人類世界還有階級存在的時候，人的階級立場對於人的政治行為具有決定的作用。黨員是無產階級的優秀兒女，他們對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可以起一定的保證作用；在任何事業中，黨員幹部多，絕不是壞事情，而是好事情。黨在挑選幹部的時候，為什麼不應該挑選黨員呢？如果真是“率土之濱，莫非黨員”，那倒是值得慶幸的。右派分子說黨只用“奴才”，似乎沒有用他們那樣的“人材”。但事實證明：黨不用他們是對的。在社會主義國家里，為什麼要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人材”呢？這些自命為“人材”的先生們其實只是忠實於反動統治階級的奴才！我們的幹部政策是德才兼備，是用人唯賢。幾年來，黨按照這個標準選拔了不少黨內黨外的優秀幹部擔任領導工作；這一鐵的事實完全粉碎了右派分子攻擊黨“用人唯親，用人唯黨”的謬論。右派分子想把黨描繪成一個自私自利、升官發財的宗派集團，顯然是顛倒是非、籠絡“人心”的一種騙術。

(四)丑化黨員，否定黨的基層領導

黨的領導不是抽象的，它是通過自己的組織和黨員來實現的。右派分子倒是很“聰明”地意識到了這一點，說什麼：“黨是英明的，可就是黨支部不好，黨員太糟。”“黨員壞得很，向上拍，向下壓。”這真是奇妙的邏輯：這個支部不好，那個支部不好；這個黨員太糟，那個黨員太糟。許多個“個別”都被否定了，那麼作為“整體”的黨還說得上什麼“英明”呢？其實這種花樣也并不巧妙，它就是“右學兵書”中臭名昭著的一條——“抽象地肯定，具體地否定。”右派分子說：“黨員壞得很”，這我們用不着講什麼道理，共產黨員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立場，和一切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作鬥爭，在他們看來，當然是“壞”的。然而廣大的擁護社會主義的正直的人都懂得一個基本事實：有黨員的學校，學校辦得較好，沒有黨員的學校，學校辦得較差；共產黨員的確是我們教育工作者隊伍中的骨幹。

右派分子還叫喊：“鄉黨支部都是些黃泥巴腿子，不能領導學校。”這實質上也是右派分子反對黨的領導的一種花招。我們認為：鄉黨支部是完全能夠領導學校的。滄水縣小學交鄉領導，出現了“三滿意”“三積極”（縣文教局、各鄉領導幹部、小學教師三方面都滿意，工作也更積極了）的新氣象，學校的政治工作加強了，教學與生產結合得更緊了，從根本上保證了學校教育沿着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在活生生的事實面前，右派分子其將何辭以對？

我們的教育一定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因而我們的教育也一定要由共產黨來領導。右派分子企圖篡奪教育事業的領導

权，把社会主义教育拉回资本主义的老路，那是徒劳的也是决不能容许的。

在干部政策上批驳右派

立 無

学校里的右派分子，与社会上其他方面的右派分子一样，在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中，对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放出无数毒箭，散发了许多谬论。恶毒地攻击党的干部政策，是他们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企图使资产阶级复辟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叫嚣说：“共产党的干部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宗派主义。”还说什么“共产党提拔的干部都是清一色的党员。”“共产党是非党不用，用人强调政治条件。”“现在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等等。有的右派分子公开叫嚣要取消党的干部政策“德才兼备”的标准，主张什么“用人唯才”，要把现在学校中的许多党员干部“拉下来”“赶出去”。

从这些反动言论中不难看出，他们反对我们用人考虑政治条件，企图以他们的“用人唯才”的反动标准来代替我们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并妄想以“共产党非党不用”等捏造的谎言来挑拨党群关系；更恶毒的是他们诬蔑党的干部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宗派主义”，其用心的卑鄙毒辣，绝不是只限于反对这个政策的本身，而是企图通过攻击党的干部政策，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并企图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来篡改党的干部政策，使资产阶级王朝复辟。

为了彻底粉碎右派分子对党的干部政策的猖狂进攻，我們必須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他們的反动論点予以严正的批駁：

历史上的任何国家政权都是以一定的階級、一定的政治力量为基础組成的，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政权在挑选使用干部和培养干部方面都是有政治标准的，所不同的只是各有具体内容，有維護劳动人民利益或反对劳动人民利益的区别。社会主义国家公开地指出这一点，而資本主义国家却竭力把自己伪装成“全民”的国家。在我国，党和人民政府历来的选择使用干部的标准就是“德才兼备”。我們是一个工人階級领导的国家，当然我們的党与政府有责任按照工人階級的政治标准来挑选使用干部。我們的学校是“国家机器的齿輪之一”，是社会主义建設的工具之一，也是无产阶级專政的工具之一，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任何把学校說成是超階級超政治的都是騙人的鬼話。我們的党在为社会主义的学校挑选配备干部时也一貫是坚持工人階級的政治标准，挑选提拔配备的干部也都是根据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来决定的。我們所說的“德”，是指下部的政治品質，是指坚定的工人階級立場，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态度；我們所說的“才”，是指干部的业务能力，是适合于担負某种工作的知識和經驗、領導能力和組織能力。由于人的階級立場对于人的政治行为具有决定的作用，因此，我們絕不應該抛开一个人的“德”去孤立地看他的“才”。必須了解，政治是統帥、是灵魂。也就是說，如果一个人在政治上是反动的，那么，他的“才能越大”，对社会主义的事业危害也就越大，因为他的“才能”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解放以

来,我們为了在教育战线上不断地巩固社会主义陣地,使学校教育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我們的党和政府曾不断地由各方面抽調大批的、經過考驗的干部到学校作领导工作;同时也从学校內部提拔了大批的同工农相結合的革命知識分子和經過考驗的先进分子作为学校的领导骨干。这些干部,一般都是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埋头苦干,密切联系羣众,在贯彻党和人民政府的有关方针政策法令,进行教育及教学改革工作方面都作出不少成績,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对教学业务也逐漸由外行变为內行,教育事业的成就,包含着他們的劳动成果在內。当然,有些学校领导干部,是有某些缺点甚至在工作中有錯誤,但跟他們在建設事业中逐步进步、提高的情况比起来,最多也不过是十个手指中一个比九个。他們的优点是主要的,缺点和錯誤是次要的。我們办社会主义的学校才只几年,有些同志由于缺乏經驗,或对办学的規律、特点未能完全掌握,有些缺点与錯誤也并不奇怪,何况这些缺点与錯誤并不是不可以克服的。右派分子夸大缺点与錯誤,散佈“某某除了政治之外还有什么”,声言应当“用人唯才”,反对审查干部的政治历史。誣蔑我們的政治上坚强的干部为“大惡霸”,要“打倒他”,甚至有些地区的右派分子在鳴放时期將忠于党的干部繪成國抬着遊行,进行斗爭等等。他們这样囂張、瘋狂,十足地表明了他們对党的刻骨仇恨,而他們却还打着反动的資產阶级的政治伪装——所謂不問“德”,不問“政治”,其阴谋是企图在干部政策上以資產阶级的政治标准来篡改工人阶级的政治标准,达到他們反对学校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反对无产階級專政的目的。

我們的黨和人民政府一貫堅持德才兼備的幹部標準，並在幹部工作路綫上努力建立以工人、農民以及工人階級知識分子中經過考驗的先進分子組成無產階級專政的幹部隊伍；右派分子的主張是以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剝削階級來組成統治、剝削、壓迫人民的反動集團。很明顯，這是我們與右派分子在幹部政策上的根本分歧，也是在幹部政策上兩條道路的尖銳的鬥爭。我們必須粉碎右派分子的陰謀。

右派分子攻擊幹部政策的另一個手法是給共產黨加上“宗派主義”、“清一色”的罪名。我們必須指出，自從世界上出現了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以來，資產階級和一切懷有資產階級情緒的人，也包括封建主義的殘存代表人物在內，他們攻擊共產黨的花樣雖然日益翻新，但卻始終圍繞着一個中心，就是硬給共產黨加上“宗派主義”的罪名，這說明了右派分子只不過是它們的應聲蟲而已。他們以這一罪名來誣蔑共產黨，攻擊我們的幹部政策、人事制度，正是他們仇視共產黨所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動資產階級思想本質的表現之一。

什麼是宗派主義？宗派主義是一切剝削階級和為剝削階級服務的政黨本身所必然具有並且大量培植的東西，是它們的重要屬性之一。這些剝削階級的集團對於人民羣眾的關係是統治、剝削、壓迫，它們的內部，也因爭權奪利、利害衝突而經常陷於四分五裂、宗派傾軋、你死我活的狀態之中。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所擔負的共產主義事業、解放全人類的事業，是為了最終消除這種現象。私有制和社會之划分为階級，人們為追逐私利而勾心鬥角，排斥異己，是宗派主義的最終原因。無產

階級是反對私有制的，這個階級的解放以全人類的解放為條件，因此是唯一大公無私的。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按其性質說來，決不能成為任何宗派小集團，它以全體人民的利益為依歸，本身不圖任何私利。因而共產黨始終是堅決反對宗派主義的。因此，右派分子誣蔑我們黨的幹部政策“在指導思想上是宗派主義”，正是他們資產階級所具有的宗派主義的反動觀點向黨所進行的惡毒的進攻，也是他們反動的腐朽的思想體系對共產黨和無產階級專政敵視的一種表現。

所謂“清一色”、“非黨不用”，也是對黨的一種誣蔑。我們知道，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通過自己的政黨——共產黨領導的，因而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中，黨的領導是起着決定作用的，也就是說，黨的領導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靈魂。我們的國家政權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都在黨的領導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國家最高行政領導機關的國務院來說，部長級幹部中共產黨員占57.9%，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則占42.1%。在我們學校教育方面，根據統一戰綫政策，和對知識分子團結教育改造政策，配備了各民主黨派的成員與無黨派人士作學校行政領導工作的數量也很大，這些鐵的事實是無勝枚舉的。無產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實現了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實現了全體人民的空前大團結。無產階級專政的天下，乃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勞動者建設社會主義的“清一色”。正是這一點引起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剝骨仇恨，他們誣蔑我們人民當家作主的局面為“清一色”，企圖給共產黨加上“非黨不用”的罪名。他們這種卑鄙叫

露的實質，同帝國主義口口聲聲罵我們為“極權政府”一樣，是反對在我們國家中由共產黨領導的勞動人民當權作主，而企圖讓資產階級當權作主，讓帝國主義指揮一切，製造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清一色”。

此外，我們必須明確，保證黨的政治路線實現的一項具有決定意義的工作是正確地挑選和使用幹部，因此，挑選提拔和使用幹部是根據革命和建設形勢的需要與幹部本身所具有的德才條件決定的。解放以來，黨和人民政府提拔了大批的工人、農民、婦女、青年、種種在舊社會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優秀人物到我國的各個戰線的重要崗位上來，組成了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骨幹隊伍，依靠他們的埋頭苦干，依靠他們同廣大人民羣眾的親密聯繫，我們徹底地完成了民主改革，並順利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依靠他們同人民羣眾一道不屈不撓的努力，我們國家才能有效地戰勝各方面的嚴重困難，促進各項建設事業的飛躍發展。因此，被挑選提拔的幹部都是接受了黨和人民所給的更重要的委託，更應該效忠於黨與人民，努力為人民服務，当好人民的勤務員。但是，右派分子以資產階級的反動觀點，把這一崇高的、莊嚴的革命委託與革命職責當成他們追求個人名利、升官發財的手段，並挑撥黨羣關係，把我們近年來為了適應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發展的需要，加強黨對學校的領導力量而調配一批黨員領導骨幹及提拔了一批為社會主義事業忠誠服務的非黨幹部的這一關係着學校社會主義方向的有革命意義的重大措施，誣蔑為“一朝天子一朝臣。”不難理解，這正是右派分子以其階級本能所決定的立場觀點來反對社會主義的人事制度，是腐朽的資產階級世界觀。

向无产阶级的干部工作路线的进攻。

经过反右派斗争的锻炼与考验，我们都明确了：挑选使用干部工作绝不是一件小事情，它关系着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关系着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制度，也关系着我们国家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政权性质的问题。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妄图以他们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观点来反对、篡改我们的干部政策，那是枉费心机的。我们在干部工作上必须警惕地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坚持无产阶级的原则永不动摇。

坚持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 粉碎右派分子的谰言

文 濬

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的猖狂攻击中，我们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是他们诬蔑和攻击学校教育的一个方面。右派分子刘积学说：“现在有些政治做的就是不太好，有很多学生不能升学。”右派分子王毅斋说：“这些学生参加生产真可怜。”蔡阳县南关小学右派分子李文甫说：“现在教育质量太低了。原因是学生毕业后叫回家劳动。过去学生学习是为了留洋当专家，教育质量就高。”有的右派分子还说：“学校的政治教育多了，劳动教育多了。”右派分子这些诬蔑和攻击是要我们放弃培养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取消对学生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劳动教育，从而改变社会主义学校教育的性质，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教育的罪恶目的。因此，对右派分子这个阴谋必须进行

彻底的揭发和批判。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且是为这种政治和经济服务的。教育的方针、教育的目的和任务是教育为政治、经济服务的集中体现，因此不同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也必然要求并且决定着不同的教育方针、教育目的和任务。在旧中国，反动统治者推行奴化教育、封建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使教育为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被拒于学校教育的大门之外，即使是一些勉强入学的劳动人民子女也是被按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要求来进行教育的。新中国的教育与旧中国的教育根本不同，它必须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必须反映社会主义的新政治、新经济，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对旧教育进行了系统的根本性的改造，对学校教育的方针、内容、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解放初期就提出教育“向工农开门，为生产服务”的方针，以后又提出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确定普通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学生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并且强调加强对学生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劳动教育，从而使学校教育在性质上完全成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主义学校教育。因此，这些都是必须的和正确的。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就更突出、更明确、更具体地规定了我们的教育的目的和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劳动者，这一教育方针是在我国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阶

級关系发生了大变动，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問題很尖銳，而我們必須在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兩条道路的斗爭中爭取社会主义道路的彻底胜利，必須进行技術革命，迅速地提高生产力，把我国建設成为有現代工业、現代农业和現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形势、新任务下提出的，因此，这一教育方針对指导和保証教育事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經濟服务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首先，这一教育方針，最能体现我們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教育归劳动人民所有这一根本性質。我国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管理国家大事，积极从事建設社会主义的偉大事业。我們国家这种革命的阶级的性質，决定了教育必須为劳动人民服务，文化科学和技術知識必須用来为建設社会主义的事业服务；因此，学校必須为工农开门，必須培养青年一代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从而迅速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科学知識水平，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促进社会主义建設。特别是在国内資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兩条道路的斗爭还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毛主席提出的这一教育方針，就成为教育战綫上彻底批判和克服資产阶级思想和資产阶级教育思想，特别是彻底批判和消灭旧社会遗留的鄙視体力劳动和劳动人民的錯誤观点，确立广大教师和青少年一代劳动光荣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識，爭取在教育战綫上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的兩条道路斗爭中取得彻底胜利的一个最有力、最銳利的武器。

其次，这一教育方針，积极的适应了社会主义經濟建設的

需要。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問題基本上解决了，生产力得到了大解放，因此我国人民在爭取政治上、思想上社会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同时，还要进行技术革命，向自然大进军，发展我们的经济、文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面貌和文化面貌的落后状况。对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发展工业和农业，处处都需要科学文化、技术知识，处处都需要有文化的人。要把有五亿多人口的农村建设成社会主义机械化、电气化的现代农业，更需要有千千万万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式农民。因此，教育方针规定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普通教育着重培养参加工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正适应了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跃进的需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新的教育方针，培养出更多更好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就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起更大的促进作用。

以上很清楚地说明，我们的教育方针明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体现了教育最有效地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服务。因此，我们认为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是正常现象、好现象；参加生产劳动的中小学毕业生越是增多，就越说明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得到了提高，国家生产建设得到了新生力量。这正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说明我们的学校教育办得好。右派分子把培养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和组织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的基本政策诬蔑为“现在有些政治做的就是不太好，有很多学生不能升学。”这就彻底地暴露了右派分子坚决站在与我们相敌对的立场，恶毒地反对教育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服务，并企图利用某些群众和学生一时对教育方针缺乏正确理解的这个空

子，挑撥黨與羣眾及青年學生的關係，煽惑羣眾和青年學生對黨不滿，以達到他們反黨的目的。其陰謀是非常陰險惡毒的。

我們還應當進一步從理論上駁斥右派分子散布的“這些學生參加生產真可憐”，“學校勞動教育多了”等反動的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教育思想和鄙視體力勞動和勞動人民的種種謬言。在我們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里，勞動是光榮的，工人、農民是最有前途的；因此，我們必須對新生一代進行勞動教育，使他們成為祖國建設事業的接班人。工人農民的本色就是勤勞樸素，人類社會上的一切物質財富，都是勞動人民踏踏實實辛苦勞動創造的成果。當前我國人民正以移山倒海的雄偉氣魄，做着前人沒有做過的偉大事業，一切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的人，都把為建設社會主義事業而勞動當作英勇豪邁的事情。五年來，河南省 170 多萬中小學畢業生，在黨的教導下，除了一部分升學外，大部分都堅決勇敢地參加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工農業生產勞動。這批有為的知識青年，已經遍布全省廣大農村，他們的知識正在各地開花結果，像初中畢業生李友軒，就成了養豬的專家，初中畢業生楊長江，高小畢業生歐志真，由於在農業生產勞動中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已成為全國和全省的先進生產者和勞動模範。難道這些知識青年不是最有志氣、有干劲、有前途的建設祖國的最積極的力量嗎？難道能夠說“這些學生參加生產真可憐”嗎？右派分子的這些謬言，除了說明他們企圖煽起青年學生和羣眾對黨不滿外，也充分暴露了他們那種以剝削為生、鄙視勞動的反動本質。目前雖有一些覺悟不高的學生還有輕視體力勞動、不願參加農業生產的思想，但考其實質，這種輕視勞動的思想是地主階級、

資產階級的思想觀點，和工农劳动人民的本色是不相容的。青少年中之所以有这种輕視劳动的思想，是因为社会上还存在着剝削階級輕視体力劳动、輕視劳动人民的思想余毒，还在影响着一些羣众和教师，因而这种輕視劳动的思想，通过社会、家庭和某些学校教师就有形无形地影响了学生的思想。正因为如此，学校更应当重視向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劳动教育，并向社会上和学生家長进行宣傳教育，彻底批判和肃清这种剝削階級輕視劳动的思想，从而使学生奠定劳动光荣、为参加社会主义劳动、为人民服务而努力学习的正确观点。因此，加强对学生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劳动教育，是贯彻执行教育方針的一个根本問題，决不能有絲毫动摇。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破资本主义思想，立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学校贯彻教育方針的根本任务。政治是統帥，离开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学校就不可能培养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人。因为：首先，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是不会自发地从青年学生中产生并巩固起来的，只有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政治思想教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論和党的方針政策的教育，才能使學生树立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其次，在过渡时期，資本主义思想和无产階級思想的矛盾，資本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矛盾还是学校教育工作中的一个根本性矛盾。在思想領域中是沒有真空的。如果我們不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學生，那末資本主义思想就会在学校里自由泛濫，毒害青年。因此必須“天資興无”，帮助學生树立社会主义思想。再次，我們学校培养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應該是朝气蓬勃，干劲十足，有远大理想，在社会主义建設中能充分發揮主动性和創造性的青年，只

有这样的人才能更很好地适应祖国伟大建设事业的要求。而这就必须培养学生具有明确坚定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和充沛旺盛的革命精力。综上所述,可知学校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关系着学校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关系着学生究竟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因此,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只许加强,不许削弱。右派分子叫嚷“学校劳动教育多了,政治教育多了”,其目的是企图削弱和取消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劳动教育,从而改变我们培养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教育方针,改变社会主义学校教育的性质,使青年学生失去正确的政治方向,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便于进行他们的反党活动。

右派分子在攻击我们的教育方针时,还说什么由于我们的教育目的是要学生毕业后参加劳动,学校的政治教育、劳动教育多了,因此,现在的教育质量太低;过去学生学习是为了留洋当专家,教育质量就高。这种攻击一方面是对我们贯彻教育方针所取得的成绩的诬蔑,另一方面也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企图恢复剥削阶级旧教育的丑恶目的。我们的教育目的和任务就是培养社会主义劳动者,这种劳动者:第一,必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就是要有明确坚定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具有分辨大是大非的认识能力,忠诚踏实地为社会主义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和劳动;第二,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生产知识和生产技能,熟悉本地的农活和学会使用最常用、最基本的生产工具;第三,必须具有健康的体魄,即能担任生产劳动的坚强身手。因此,我们必须坚决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这样就要求教育必须结合政治、结合生产、结合实际。学校教给学生

的知識，歸結起來不外生產鬥爭知識和階級鬥爭知識兩大類，而向學生進行教育，如果不結合社會的政治鬥爭、生產鬥爭和學生思想等實際情況，學生的政治認識、文化知識是不會深刻和鞏固的，這些知識也會是沒有根基的。以上三個方面，圍繞着培養社會主義勞動者這一中心目的構成一個統一的互相聯繫的整體，三者之間互相影響，互相促進。譬如學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做得好，學生的政治覺悟高，為社會主義而學習的目的明確，就會推動學生的學習和參加勞動的積極性；而教學與生產勞動結合，勞動教育進行的好，就會使理論與實際相結合、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相結合，這樣不僅能使學生得到鞏固的文化科學知識和生產知識，而且還能通過生產勞動實踐激起學生對社會主義事業的熱愛，提高思想覺悟，並使身體得到勞動的鍛煉。因此，貫徹教育與生產相結合的方針，組織學生參加體力勞動，非但不會降低教育質量，相反還是提高教育質量的重要關鍵。河南省長葛縣第三初中，三年來一貫堅持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勤工儉學的根本原則，學生一面讀書，一面勞動。他們實踐的結果證明，學生們不僅掌握了生產技能，而且學習成績也是優良的。如1957年畢業生295人，升入高一級學校的學生75人，升學率占到25%；而同一時期許昌專區各校平均升學率僅為15%。再看沒有升學而回家生產的220名學生，他們不僅安於平凡的勞動，而且由於學會了生產技能，到農業生產崗位上就成了“地地道道”的新農民了；半年時間，就有53名被評為生產模範。據106人的統計，當記工具的12人，會計43人，團支書19人，管理區主任（即社長）2人，生產隊長2人。事實已經證明，長葛縣第三初中這種堅持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的办法，是具体实现培养学生成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重要途径。在这些铁一般的事实面前，在这些无可辩驳的真理面前，右派分子散布的“现在的教育质量太低了”等恶言谰语，显然已不攻自破了。

駁斥陈友松对馬克思列寧主义 教育学的誣蔑

顧 明 远

右派分子陈友松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副主任。解放八年来，他对于向苏联学习的方针始終抱着不正确的态度，当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针以后，他就打着“反教条主义”的幌子反对学习苏联，公然宣揚资产阶级教育学，企图为被批判了的资产阶级教育学翻案。他在1957年4月30日的文汇报上发表的“教育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一文，就是向馬克思列寧主义教育学猖狂进攻的具体表现。在校内，陈友松利用我們社会主义大学的讲台，宣揚资产阶级学說，丑化馬克思列寧主义教育学；他并在学生中打击党员教师，煽动学生，妄想篡夺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权，把我們的师范教育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在这里，我着重談談陈友松是如何丑化苏維埃教育学和如何反对向苏联学习的方针的。我們必須对他的猖狂进攻給以有力的回击。

陈友松說：“苏維埃教育学很年輕，年輕必幼稚。”他在这里并不是拿科学的教育学与其他科学，如物理、化学相比，而是和资产阶级教育学相比。他說，资产阶级教育学已有六十年的历史，而苏維埃教育学从1930年才开始有馬卡連柯的教育

体系，到现在只有 20 多年。这种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我們都知道，苏維埃教育学即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是馬克思、恩格斯，科学的教育学是在馬克思主义指导下和資产階級教育学的斗争过程中成長起来的。十月革命后，这个思想体系在實踐中大大发展了，到1930年以后建立了现在这样的体系。现在这样的体系只能說是科学教育学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不能割裂它发展的历史，說它只是从这个体系建立以后才算有这门科学。再說，是不是年輕必幼稚呢？我們說，苏維埃教育学是科学的教育学，它比資产階級反科学的教育学成熟得多。因为，首先，苏維埃教育学以馬克思列寧主义为基础，运用了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科学地解决了教育学上的根本問題；而資产階級教育学却不可能解决任何根本問題，甚至資产階級的某些先进的教育家理解社会現象方面，也是站在唯心主义立場上的，他們不可能揭露社会发展的規律。事实証明，只有馬克思列寧主义才能揭露社会发展規律，因此，只有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义基础上的教育学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其次，馬克思、恩格斯关于教育的理論，經過列寧、斯大林的充实和发展，經過几十年革命实践的考驗，已变得更加成熟了。事实証明，苏維埃教育学是教育科学发展的最高阶段。最后，还应指出，苏維埃教育学在与資产階級教育学的斗争中，已彻底批判了資产階級的反动教育理論，苏維埃教育学是真正科学、真正先进的教育学。事实証明，苏联教育事业在苏維埃教育学的理論指导下，已得到空前的发展，就連我們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認。例如美国反动教育家乔治·康茨說：“……苏維埃教育制度在現代两个世界的斗争中是一个可怕的因素

……”^① 所以我們認為，資產階級教育學根本不能與反映社會發展規律、反映客觀真理的蘇維埃教育學相提並論。

陳友松還說：“蘇聯現在關於教育方面的文章千篇一律，先是馬恩列斯怎麼說，然後是馬卡連柯、加里寧怎麼說，再就是某某娃怎麼說，最後作者自己的意見只有一點點。”科學教育學既是建築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經典著作正說明了蘇維埃教育學的科學性，這有什麼不可以呢？蘇聯的某些文章是有缺點的，也有教條主義現象，但蘇聯經常強調提高質量，克服教條主義，難道個別問題就能說是千篇一律嗎？就拿最近一年的“蘇維埃教育學”雜誌來說，那上面對教學方法、道德教育的講授、教育與發展等等問題經常進行討論，意見很多，也很分歧，這能說是千篇一律嗎？能說是“自己的意見只有一點點”嗎？再拿教育史來說，米丁斯基、康斯坦丁諾夫、克拉斯諾夫斯基都有很大的成就。克拉斯諾夫斯基對夸美紐斯特別有研究，可說是國際上研究夸美紐斯的權威。這能說是千篇一律嗎？陳友松有一次在給研究班上課時說：“蘇聯教育學博士、副博士論文質量很低。”我們再拿岡察洛夫的博士論文“教育學原理”一書來說，雖然它在蘇聯受到學者們的很多批評，但它還是一本非常有用的參考書。杜賀夫內依的“教學法原理”一書評價也很高，但杜賀夫內依本人還只是一個副博士。在蘇聯，學者們經常批評某些論文的缺點，這說明他們要求很高很嚴，但決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蘇聯博士、副博士論文的質量低。

陳友松在介紹蘇維埃教育學現狀時說蘇維埃教育學落后

^① 教育譯報，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第1期第30頁。

于实际，根据凱洛夫的分析有六个原因。接着便歪曲事实說：“凱洛夫沒有抓住本質問題，这就是沒有深入分析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个人崇拜。凱洛夫是苏联的权威，反对凱洛夫的意見不能存在。譬如，苏联一次有关教育科学的會議，認為教学原則有十个，但由于凱洛夫的教育学上只有五个，所以現在人們還不敢承認有十个”（摘自教育系二年級学生的筆記）。实际上在杜賀夫內依的“教学法原理”中有七个教学原則，在岡察洛夫、叶希波夫編的教育学中有九个教学原則，各教育家的选择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苏联普希金教授1953年在中国講学时曾指出：“教科書中只談五个教学原則，因为它是教科書，它不可能把科学的教学原則都包括进去。事实上教学原則非常多，更大胆地說，甚至于有些教学原則，因为我們的科学知識不夠，我們的教育学还未能发现。”普希金教授在他的教育学講演录里就談了十五个教学原則，更指出“这也不是全部”。另外，凱洛夫院士在苏联的确受到教育界人士极大的尊敬，但并不是像陈友松所說的个人崇拜。恰恰相反，他們对凱洛夫院士的工作是經常提意見和批評的。这一次苏联教育界对他新編的教育学的討論和批評就是一个明証。此外，更重要的是苏联共产党对苏維埃教育学的关怀，苏联共产党的指导与批評，使苏維埃教育学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后，苏維埃教育学进一步飞速发展的事实，更加証明了这个結論。陈友松对这些事实比一般人知道得清楚，可是他还惡意地加以歪曲，这无非是想抹煞苏維埃教育学的成就，把它說成一团糟。

陈友松又誣蔑苏联对资产階級教育学和祖國的遗产采取

“虛无主义的态度，一棍子打死”。这也是与事实完全不符的。苏联非常重视批判地接受人类宝贵的遗产。偉大的苏联教育家克魯普斯卡娅早在十月革命之前(1915年)就写了“国民教育与民主”一書，对过去的某些教育家第一次用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出了评价。十月革命后 40 年来，苏联教育界对过去历史上知名的教育家基本上都作出了公正的评价。这就是苏維埃教育学的偉大成就。在書籍出版方面，苏联教育界对过去的著述也很重视，例如夸美紐斯的著述出有三卷集，关于論述夸美紐斯的著作就更多了。洛克、盧梭的著述也都有选集，就連反动的赫尔巴特的著作也出了兩本集子。苏联教育界对祖国遗产就更重视了。例如，烏斯申基有十五卷集，为了普及还有兩卷集；赫尔岑、柏林斯基、車尔尼雪夫斯基、杜布洛留波夫、皮薩列夫、皮拉果夫、托尔斯泰等都有选集；連不大著名的謝苗諾夫、沃多沃索夫都有选集。至于苏維埃教育家的著作，如馬卡連柯有七卷集、克魯普斯卡娅、加里寧也都有选集。苏联重视历史遗产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們很好地学习的。

的确，资产階級教育学在苏联是很不吃香的。但是为了跟反科学的资产階級教育学进行战斗，并在战斗中发展科学的教育学，苏联教育家們也十分重视研究资产階級的教育学。而陈友松却为资产階級教育学抱不平，仇視苏联沒有讓资产階級教育学到处泛滥。

最近，苏联教育界开始重视統計学，陈友松就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他引用了“教育譯报”第三期关于統計方法的一篇論文，說“苏联也已經承認否定教育統計是不对的”，殊不知苏联教育界強調的是統計方法，而不是恢复资产階級教育統計

學。在陳友松引用的那篇論文里已經明白指出，過去“研究者們根據變異的數學的統計方法，以及對它的不正確的理解，就依據調查表和智力測驗的資料，機械地按智力發展、天才和其他特征把學生分為數等，把反科學的資產階級兒童學的一些原理搬到蘇維埃教育學中”，因此那種“脫離教育學理論，不顧教學的實際情況和所研究現象的質量特點所進行的研究，給教育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帶來了危害”。可見統計學也是有階級性的。

從陳友松上述的言論中可以看出他是如何丑化了蘇維埃教育學。等到丑化了蘇維埃教育學以後，他就開始進一步反對向蘇聯學習的方針。他極力抹煞我們向蘇聯學習的成績，誇大缺點，把缺點和錯誤歸罪於向蘇聯學習的方針。他居然說：“教育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我認為最值得注意的是表現在領導貫徹學習蘇聯這一不變的基本方針上。教育部門開始採用蘇聯的教學計劃的時候，就沒有真正體會其精神實質，完全照抄照搬。”（見1957年4月30日“文匯報”）我們就拿師範學院暫行教學計劃來說，顯然不是簡單的照抄照搬，而是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經北京師大教師和專家們的廣泛討論，最後又在全國高等師範教育會議上討論修訂而成的。因此這個教學計劃具有很多優點。最主要的一點是，它明確了培養目標和確定了實現培養目標的四個有機部分：政治理論科目、教育科目、專業科目及教育實習。這個教學計劃使舊的師範教育轉變為新型的師範教育。這難道不是一個很大的成績嗎？

陳友松參加過編訂教學計劃的工作，但他却在文匯報那篇文章中寫道：“教條主義者曾經扼殺了不少科學部門，教學

計劃的銅牆鐵壁，使得許多必要的科學無法生存，結果是形成缺門很多，而不少學有專長的人改行不務正業。”陳友松懷恨教學計劃，是因為有了教學計劃，資產階級的那一套就無孔可鑽了。大家知道，教學計劃是根據培养目标來制訂的，它並不包括所有的科學部門。同時一種科學也不是依靠了有這門課程才能生存和發展。因此，即使形成某種缺門，也絕不能歸罪於教學計劃。陳友松在這次討論修訂教學計劃之前為教育系擬訂了一份教學計劃草案，上面有很多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師範教育的東西，充分暴露了他所謂“結合中國實際”是販賣怎樣的貨色。

陳友松不僅抹煞我們的成績，而且對我們的幹部一一加以打擊，特別是對黨員幹部，極盡其丑化的能事。他誣蔑老幹部只有“打游擊的條件反射”、“頑固不化”等等。他說年輕教師“只學了一些蘇聯的教育學，又是一些條文，他們不懂得中國古代的東西，又不懂得外文，不懂得其他國家的東西，像浮雲一樣飄在空中，這樣沒有東西，是架空的”（和教育系二年級同學的談話）。他還猖狂地煽動學生罷了一位青年講師（黨員）的課。實際上現在青年教師掌握教育學的水平是不是像陳友松所說的那樣差呢？解放以來，我們在学习蘇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特別是跟專家學習的一些教師，目前已有相當的水平。這些教師現在的水平與解放初期是不能比較的。我們青年教師工作中還有很多缺點，還需要加倍努力。但是完全不是陳友松所說的那樣，連教學工作都不能擔任。上學期教育系的青年教師在北京市內幾個中學做過報告，頗受中學教師們的歡迎。可見，我們青年教師掌握的教育學並不是什麼“條條”。

友松身为教育系副主任，这些情况他是了解的，他是存心抹煞我們学习苏联的成績。他不仅用这种态度对待我們这些年輕人，就是对待苏联專家也是这样。他自己也承認，他千方百计地想贬低苏联專家的威信。

从陈友松以上的言行中，我們很清楚地看出，他的企图无非是想打垮苏維埃教育学，抹煞我們学习苏联的成績，最后再喧嚷：“学习苏联学錯了，苏联没有什么可学，今后不能再向苏联学习，应该学习资产阶级的东西。”他这种誣蔑苏联的成就，向馬克思列寧主义教育学进攻的言論是极其惡毒的，我們必須粉碎他的阴谋，捍卫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科学的教育学，坚定不移地貫徹学习苏联的方针。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 知識分子的道路

——对薛宗元的中国旧知識分子“特点”的批判

易 明

目前，中、小学教师正在进行整风。趁此，我想来談談知識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道路問題，并以批判薛宗元“給省委第一書記的一封信”中所談到中国旧知識分子“特点”，为談論的主要內容。

薛宗元是右派分子。一般地說，在政治上同右派分子划清

界限是比較容易的，因為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面貌已
被揭露。然而，要清除右派分子在思想所散播的毒素，就比較
費力和麻煩了。因為，右派分子總是“粉墨”而後“登場”的。
薛宗元不就是把中國舊知識分子的面貌勾畫得那麼超凡入
聖、十全十美的樣子嗎？所以，他的謬論曾經得到一些人的贊
賞和共鳴，例如常州的右派分子何紹南、莊申生就曾以之作為
向黨進攻的資本。有一些人，嘴上雖不說，心裡卻贊成；也有
一些人恍恍惚惚，是非莫辨。所以然者，就是因為這些人被美
麗的偽裝迷惑了。因此，經右派分子塗改了的知識分子的面貌，
實在有矯正的必要。

為了行文方便，先按照薛宗元的論點的順序，擇其要者加
以批判。

二

特點一：“中國知識分子，有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思想，是愛
國主義。解放後又加上了一條原則思想，是社會主義。因此，他
們極願意為人民、為祖國、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貢獻出力量。
當這個力量受到阻礙或委屈時，他們是非‘鳴’不可的。”^①

應當承認，中國絕大多數（並非全體）知識分子是愛國的。
近百年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壓迫，使中國人民對帝國
主義懷着深刻的仇恨，激發了民族自尊心和保衛祖國免於滅
亡的愛國主義思想。而知識分子中的先進分子，特別敏感於亡
國天種之禍。這是事實。但也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具有民族自卑
感，存在着嚴重的奴隸思想，有些人甚至走上了賣國求榮的道
路，成為民族的叛逆（汪精衛是知識分子，胡適也是知識分

子)。而更多的人則徬徨于十字路口，沒有勇氣參加勞動人民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隊伍，空具愛國之名，却無愛國之實。這些也是事實。此其一。其二，愛國主義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具體內容的。有反動統治階級的所謂“愛國主義”；有人民羣眾的愛國主義。因之，就發生了一個愛什麼國的問題：愛社會主義的新中國，還是愛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的舊中國？右派分子葛佩琦認為沒有共產黨，中國也不會亡。顯然，他所愛的是已經被人民推翻了的舊中國。如果把階級屬性不同的愛國主義等同起來，那就是魚目混珠，別有用心。其三，具有無產階級世界觀的人，應當把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反對以民族主義為標榜的愛國思想。我們認為，民族利益是和無產階級利益一致的，民族利益和無產階級利益又是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利益一致的，是和全世界無產階級解放的利益一致的。如果把愛國主義思想從國際主義思想中分割和孤立起來，那末這種“愛國主義思想”就有被帝國主義用來進行復辟的可能。

愛國主義是個好字眼，已經被消滅的和將要被消滅的剝削階級，為了自身的階級利益曾經利用它蒙蔽過人民。我們必須根據歷史條件加以具體分析，才不至上右派分子的當，才不至自欺欺人。

再說社會主義。我們應當肯定，社會主義確實是鼓舞人心的，許多知識分子是願意為這樣一個具有無限生命力的社會主義制度服務的。但是，整風運動表明，知識分子的政治立場並不一致：有些知識分子，已經堅決走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再不回頭了；但也有少數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的右派，已經堅

决地走上了反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更多的知識分子則还是动搖的，一面認为社会主义制度好，一面又躊躇不前，从旧社会帶來的一套思想作风、生活習慣，还在起着拖后腿的作用。因此，目前还必須在知識分子中进行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以解决广大知識分子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的矛盾問題。如果認为所有的知識分子，已經无保留地接受了社会主义，已經用不到思想改造，那是完全錯誤的想法。此其一。其二，我們还应了解，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有希特勒式的社会主义，有民族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有修正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还有空想的社会主义，而这些，都是和我們所主張的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有根本区别的。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用阶级斗争的办法，首先进行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建立无产阶级專政的政权，彻底改变生产資料的所有制，并进一步开展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革命，为进行技术革命鋪平道路。可見我們所講的社会主义，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不是妥协的、改良的、麻痹无产阶级革命意志的社会主义。为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奋斗，这是一个原則性的問題。资产階級知識分子有軟弱性的弱点，常常容易在这个原則性的問題上走样，而倾向于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种危险的傾向。

再其次，談到所謂“鳴”的問題。薛宗元認为知識分子是有爱国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是极愿为国家、为社会主义貢獻力量的，因此，在不能听其發揮力量时，就非“鳴”不可了。这里講兩点：首先，我們对凡是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并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正是欢迎之不暇，怎么会使这个力量受到阻碍和委屈呢？如果由于个别事实，而抹煞絕大多数知識分子

已經得到的良好的工作条件，那显然是对共产党的知識分子政策的誣蔑。其次，我們承認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之間存在着人民內部的矛盾。我們提倡用大鳴大放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但是有兩種鳴放：一种是为了保卫和巩固社会主义事业而鳴的，其目的在于解决矛盾。这就是从团結的愿望出发，經過斗争和批評，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結。还有一种鳴法，却是为破坏和瓦解社会主义事业，使新东西毁灭，其目的在于制造和扩大矛盾。这就是，利用大放大鳴，准备起来造反的。薛宗元以威胁的口吻，說“非鳴不可”，到底是屬於那一种呢？这是不言而喻的。

三

特点二：“他們由于生活面較广闊，知識較丰富，对新事物最敏感，但接受新事物时，必然要經過一段時間考虑和証实才完全相信。只要接受了，就能巩固，也能提高。因而他們对人對事是信‘說服’不信‘压服’的”。

首先，知識分子有一定的知識，否則就不是知識分子了。至于說到生活面較广闊和知識較丰富，那实在是言过其实的自詡，这点毛主席在“整頓党的作风”一文中，已經分析得一清二楚。实际情况是，絕大部分的旧知識分子，是依靠劳动人民的血汗，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他們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籃，既不知体力劳动的艰辛，也沒有經過政治的鍛煉。象这样的人，怎么可以說是生活面較广闊，知識較丰富呢？这种自高自大的惡习，是在旧社会里养成的，那时劳动人民还没有翻身，知識分子尽可自吹自捧，高自位置。現在已是新社会，他們却

还不服膺这样一个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实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农分子的知識有时倒比他們多一点。”^①右派分子更不心服，尾巴也翹得特別高，只能捧，不能碰。結果，工人农民說話了，这条尾巴也就非夾起来不行。

其次，知識分子确实比較敏感，容易接受新事物，因为有了一点知識，腦子总比較灵活和开朗些。但有些知識分子又确实显得比較鈍滯，比較頑劣，有时死鑽在牛角尖里，想入非非；有时抱殘守缺不肯睜开眼睛看看现实。許多右派分子，从常情講（姑不論階級立場），实在是愚不可及，而“頑劣，鈍滯，都足以使人沒落灭亡”（魯迅語）。至于談到接受新事物，有兩点要弄清楚：一点是階級立場問題。明明是香花，而有人竟以为是毒草，明明是新事物，有人竟加以摧殘，馬克思主义明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社会主义明明是最优越的制度，而竟有人拚死命地反对它，这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不是階級立場所决定的嗎？难道不是世界觀的問題嗎？所謂時間的考驗和証实，决不是一句空話，我們并不反对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但首先要端正立場，才能正确地判断大是大非，大善大惡。我們和右派分子是永远有分歧的。根本問題是在于要社会主义的土壤，还是要資本主义的土壤。另一点是實踐問題。新事物是在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實踐中生長和发展起来的，离开實踐也就很难談到从感性提高到理性上来接受新事物。許多知識分子，由于整天捧着書本，脱离實踐，仅凭道听途說，一知半解，妄下判斷，这不是真正接受新事物的态度。

离开實踐来談接受新事物的方法，这是对自己的諷刺。站

^① “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17頁。

在資產階級立場，來談接受無產階級所創造的新事物，那更是雙重的諷刺。

再其次，談談所謂“說服”與“壓服”的問題。團結、教育和改造的政策，是黨對知識分子所採取的一貫的政策。團結——批評——團結，這就是說服的方法，是黨解決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的方法。黨希望知識分子改變自己的世界觀，而且誠心誠意地幫助他們自覺地、逐步地走上這條美好的道路，從來沒有強迫他們接受任何東西，也就是從來反對對知識分子採取壓服的方法。這難道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嗎？不錯，我們是反對無原則的遷就的。因為遷就知識分子，不加強知識分子的改造，非徒無益，而反害之。所以，決不能認為嚴肅的批評和幫助是壓服，也不能認為衷心希望他們接受新事物是惡意。當然，如果由一般的人民內部矛盾，轉變成為敵我矛盾時，那就必須用“壓服”的辦法來解決這個矛盾。否則，為什麼要無產階級專政？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就是這樣。但是，即使如此，我們對右派分子，也是採取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解決這個敵我矛盾的，仍然不主張採取極端辦法，仍然給予他們出路。因為我們堅信工人階級力量強大，不怕少數右派分子造反。因之所謂“說服”與“壓服”，仍如薛宗元所說，要“對事對人”而論，不能籠統言之。該說服而壓服，那是完全錯誤的；該壓服而說服，也是完全錯誤的。

四

特點三：“他們有各種類型，各種風貌。大體上分析起來是冷靜而又激動，脆弱而又堅強；狹小而又恢宏；既多濃郁的愛；

更多熾烈的憎。所以對待知識分子不能‘簡單化’；不能以‘一成不變的教條框子去套’。應該用具體的問題，分別的解決辦法才行。”

讀起來到很堂皇，但是，第一，這里所說的知識分子的“風貌”的內容，實質上是早已臭名遠揚的資產階級的“人性論”的別稱，並沒有什麼新鮮氣味。我們認為，在階級社會里，只有階級的人性（風貌），沒有超階級的人性（風貌），只有階級的愛與憎，沒有超階級的愛與憎，只有階級的堅強性與恢宏性，脆弱性與狹小性。在反動的階級敵人面前堅貞不屈，這就是階級的堅強性與恢宏性的最偉大的表現。反之，在反動的階級敵人面前卑躬屈膝，這就不僅是脆弱與狹小，而是可恥的奴隸主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才是對無產階級的最偉大的愛，和對反動階級無限的憎。離開階級性，空談知識分子的抽象的所謂風貌，是自欺欺人，是資產階級放的毒箭，也是右派分子向無產階級進攻時，從資產階級的思想武庫中揀來的爛武器。結果，只有繳械投降，不管他心裡服不服。

第二，毛主席老早說過：“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①如果知識分子真正同工農羣眾結合起來，就確實是堅強的，恢宏的。我們的革命先烈，象李大釗、瞿秋白、方志敏等同志，是知識分子，他們在敵人面前大義凜然，視死如歸，我們的領袖毛主席也是知識分子出身，他的那種對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愛，對一切反動階級的憎，他那種堅強的革命意志，

①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4頁。

恢宏的革命气魄和革命的乐观主义，是无产阶级本质的最集中的表现，他藐视任何敌人，结果敌人一个一个地被打倒了。反之，如果知识分子不愿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又自以为了不起，那就永远是脆弱的、狭小的，或者老死于户牖之下，或者跟在敌人后面，分食残羹余汁。党今天所以强调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就在于希望他们发扬这种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坚强性和恢宏性，发扬苦战精神，把我们的穷困的落后的祖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兴旺的祖国。离开同工农群众的结合，空谈这些知识分子的特点，那是右派分子向无产阶级的挑战。

第三，知识分子出身于各个不同的阶级（主要是剥削阶级），带来了一定的特点（是各个阶级特点的反映），这是不错的，不注意这一点是不对的。在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时，对各级各类知识分子，要进行具体分析，这也是必要的。但是，既然都是知识分子，就有他们的共性。他们大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过的是资产阶级的生活，这些共同的地方，决定了他们在政治立场、意识形态方面，也必然有共同的地方。最基本共同点是都在政治立场上有动摇性，是都具有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思想改造的焦点，就是要彻底改变世界观，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是希望他们能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个共同性的问题上，帮助知识分子前进，决不能说是“教条主义”。就是在处理个别的具体问题时，或者说，各人的特殊性的问题时，也必须从这个共同性的问题出发。许多知识分子喜欢强调个性，忘记共性；喜欢计较芝麻问题，容易忘记西瓜的问题，这正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弱点。右派分子就是利用具有这

种弱点的知識分子，作为他們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嚙罗的。他們的目的，我想，就在于企图恢复他們所說的知識分子的风貌，恢复他們在封建社会、資本主义社会中的“精神貴族”的地位。殊不知我国在地球上已改变了顏色，不能再去欣賞当年的“风貌”了。必須更絃易轍，同无产階級共命运、同呼吸，这才是知識分子的康庄大道。高唱資產階級“人性論”的濫調，只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墮落下去，一直到不可收拾。

五

特点四，“正因为表現在知識分子身上优缺点的矛盾統一，所以他們重礼貌、愛面子、自尊心特別強，骨气最講究。不容易在感情上忘記自己身上的創傷。他們歡迎改造，但反对以‘改造者自居’的改造。他們接受批評，但反对‘圍剿式的扣帽子’批評。”

知識分子的政治、思想和感情上，确实存在着矛盾。但这种矛盾，是不是必然产生这些“重礼貌、愛面子、自尊心特別強、骨气最講究”的所謂特点呢？这些所謂特点，又是不是必为知識分子所独有，因而足以驕人呢？实际情况是：在历代的知識分子中，有一部分知識分子，确实具有这样一种性格，他們在敌人面前決不屈辱，所謂“头可斷，志不可屈”。但是也有一部分知識分子，走了相反的道路，表现出最无礼貌，最不要面子，最沒有自尊心，最沒有骨气，所謂“有奶便是娘”。

現在，我們必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站在人民的立場上，重新来思索这些概念的涵义。

我們提倡人民之間应当互相尊重，应当有禮貌；但是，我們反對封建式的禮貌，反對唯我獨尊的禮貌。至今還有不少知識分子，要求別人對他有禮貌，而自己卻可以照老樣，鄙視工农羣眾。這是什麼禮貌呢？堅持這種“禮貌學”的人，又何以自圓其說呢？

我們反對虛偽的面子，我們認為愛面子的心愈強烈，在它的背後隱藏着虛偽的東西也就愈多。我們認為，用真、善、美的面子，去換掉假、惡、丑的面子，這不是傷害面子，而是增加面子的光彩。我們認為，凡是表里一致，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既不會有人去傷害他的面子，他也不會斤斤於面子的得失。因為他沒有什麼虛偽的東西要用破爛的面子來掩飾，經得起考驗。俗語說：樹要皮，人要臉。樹不死，皮不枯，人的靈魂純潔，面子也就光彩。如果靈魂已經腐爛，人臉就成為虛偽的假象了。

說到自尊心，也要分析是什麼性質的自尊心。仇恨帝國主義的民族自尊心，我們要大力發揚；喪失了人格的尊嚴，自暴自棄的人，我們要堅決反對。我們尊重堅持真理，對科學採取老實態度的人；我們反對自吹自捧，自以為是的人。薛宗元為什麼說知識分子的自尊心特別強呢？大概就在於他是一個有知識的人，好象特別尊貴。其實這種個人主義的自尊心，是沒落階級思想的反映，在它的裡面同樣包含着大量的心虛與偽善的東西。殊不知愈有知識的人，應該對勞動人民愈謙遜，否則就是忘本，而勞動人民是決不會不尊重一個謙遜的人的。

說到骨氣，就要象魯迅那樣沒有絲毫奴顏和媚骨，才是最可寶貴的。如果把反抗社會發展的規律，反抗社會主義的道

路，反抗黨的領導，也算做骨氣，那末，那些遺老和遺少也就應該受到尊敬了。這豈不是千古奇談！

如上所述，我們必須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下，分析這些概念的內容，辨別哪些是應當繼承和發揚的，哪些是應當反對和改造的，只有這樣，才能揭穿右派分子以偽亂真的卑劣伎倆。

談到思想改造問題，薛宗元一面宣稱歡迎改造和接受批評，一面又宣稱反對“以改造者自居的改造”，和“圍剿式的扣帽子的批評。”什麼叫做“以改造者自居的改造”呢？黨在舊知識分子中進行思想改造工作，目的在於幫助知識分子解決如何適應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解決這樣一種複雜的矛盾，就必須要有黨的領導，難道可以把黨的領導解釋為“以改造者自居的改造”嗎？在歷次思想改造運動中，雖然成績是基本的，但同時我們也承認在做法上有粗糙的地方，曾經傷害了一些知識分子的感情，今後必須避免這種缺點。難道就可以把做法上的這些缺點，解釋為“以改造者自居的改造”嗎？這顯然是很荒謬的說法。薛宗元所以製造這一頂大帽子，目的無非是反對思想改造。的確，有不少右派分子，在這一問題上做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文章。他們所以反對改造，當然不是為了過好社會主義關，而是為了回到資本主義關里去。

再說，什麼叫做“圍剿式的扣帽子的批評”？思想改造的方法是團結——批評——團結，這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根本方法。而鬥爭或批評，又是完成思想改造的必要過程。誰也不應當把同志式的善意的批評，看做是對敵人的“圍剿”。而且，既然要通過鬥爭或批評，弄清大是大非，扣帽子也是必要的。扣得恰當，好處很大，不扣倒是對的。大家是光頭，就不能看

濟政治上左中右的分野，思想上的先進與落后的區別。沒有區別，好人固然得不到鼓勵，壞人也就更難改造。我們反對亂扣帽子，也反對一律是光頭。說也奇怪，薛宗元一面反對“圍剿式的扣帽子的批評”，一面却為我們製造了兩頂大帽子，這是什麼式的批評呢？這又其意何居呢？反對批評而已矣！的確，與人民有隔閡，與新社會有隔閡的人，極容易忘掉被帝國主義鞭撻的創傷，卻極不容易忘記在革命的大風暴中所碰到的這種“創傷”。其所以有極容易與極不容易之別，也正說明了他的愛憎所在。愈不忘記右派分子所說的“創傷”（毋寧說是仇恨）的人，就愈會帶來愈多的創傷。人民是懂得什麼是創傷，什麼是仇恨的別名的。

六

特點五：“目前很多人都有‘邦有道，貧且賤也，恥也’的感覺。有‘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悲哀。有‘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嘆息。……”

在薛宗元眼里，知識分子在新社會的遭遇，真是淒涼萬狀，不幸之至。不是有“很多人”在過着“貧賤”的、“悲哀”的、“嘆息”的生活嗎？這哪里是邦有道的現象？於是，薛宗元之類的人，在緬懷一去不返的舊時代之餘，準備揭竿“起義”了。然而，我堅信，絕大多數人都會起來“鳴鼓而攻之”的。因為這是最露骨，又是最愚蠢的誣蔑和挑撥。如果歷史是可信的，那末，誰都可以問問歷史，哪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有社會主義時代的知識分子那樣得到人民重視，那樣得到廣闊的所謂“用武之地”。我們懂得，我們所幹的事業是史無前例的。我們衷心希望

知識分子能真正成为“志在”社会主义“千里”的英雄人物，也就是說，成为又紅又專的、忠实于社会主义的、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解放以來，我們在这一方面，已經做了許多著有成效的工作，今后还将用更大的努力，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当然，还不能說对每一个知識分子，从絕對的意义上說，已經做到材尽其用，如同已經得到很好安排的知識分子，也不能說每一个都竭智尽忠为社会主义服务一样。在培养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道路上，有人进步了，有人又落后了，甚至还有右派分子。因此，安排調整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次完成。

几乎所有的右派分子，都自認是一匹超羣的駿馬，一个英武人物，离开他們，仿佛天都会塌下来似的。他們有一个貪得无厌，极为強健的脾胃，常常怨恨吃得不滿足。薛宗元的“非‘鳴’不可”的祕密，就在于党沒有把他当作“高級知識分子”看待，就在于他这“一个忠实而虔誠的學術研究者”，现在还是中学教师。于是乎得出一个結論：“象我就是个在工作和安排上需要适当改善的人”。的确，在新社会里絕无右派分子的“用武之地，”因为他們的用武之地，已被人民挖掉，他們企图利用社会主义之地，用資本主义之武，那可办不到。如果是一个自命为忠实于社会主义的人，而又浩叹“无用武之地”，那就象一个自称素食的和尚，浩叹沒有肉吃的痛苦一样，那显然是早已在思想上准备还俗的“和样”，或者根本就是在庄严的大雄宝殿里鬼混的“和障”。

薛宗元的这种象旧社会里沒落文人的叹息；在中了个人主义的毒的知識分子中，是可以找到共鳴的朋友的。他們也是自視甚高的人，自以为是“內行”，看不起所謂“外行”的領導，

自以为有知識，看不起工农干部，自以为“品学兼优”，“大材小用”，不安于位，常有怀才不遇之叹。久而久之，这种个人主义，发展到不能自拔时，就可能同右派分子穿一条裤子。须知，从个人主义出发向人民要东西，我想，人民不仅不会給，还要同这种个人主义作斗争。反过来说，如果有功于社会主义事业，那末，就是不伸手，人民也会給他应得的荣誉。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就需要这样“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虚夸和骄傲”的先进人物。

任何社会，都有而且不能不有一定的分工。教师的天职，教师之志，就在于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教师的用武之地就是学校，就是与生产密切結合而又为生产服务的学校。能尽其职，就是最大的光荣，否則，虽富且貴于一时，恥也。

在旧社会里，确实有一些知識分子受到压迫，不能舒展其才，发出悲鳴。也确实有些无聊文人，卖弄才华，盗名欺世。然而在新社会里，真是大智大勇者，对于这种旧社会的知識分子的陋习，正解脱之不暇，哪有功夫再来翻版。

七


特点六：“更有一种‘生死以之’的追求真理和保卫真理的‘書呆气’。特別可惡別人‘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他們无比的珍惜‘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今天应该說：知己是代表人民的党和领导）因为他們并不重視生活的照顧，物質的报酬，甚至影响他們向科学进军的政治待遇”。

第一，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沒有抽象的真理，而实践又

是发现真理、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试金石。在我国的革命史上，确实有许多先进的、革命的知識分子，为追求馬克思主义的真理而牺牲自己最宝贵的生命；为保卫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而对右派分子进行坚决斗争。他们才不愧为工人阶级的知識分子，他们才是知識分子队伍中最出色的代表人物。离开了馬克思主义的真理，离开了具体斗争，侈谈追求和保卫真理，不是对真理的歪曲，就是十足的“書呆气”。薛宗元没有说明所追求和保卫的是什么真理，只說知識分子有这么一股追求和保卫“真理的气”。但是从他这篇文章的論点看来，他所追求和保卫的真理，决不是馬克思主义，而是反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如果把他的这一股气，和“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联系起来看，就更明显。在旧社会，真理在“士为知己者死”的“士”那里。他的“真理”是不值一文錢的。誰是他的“知己”，誰就是他所效忠的主人。因之，在他这句话后面的，即在括弧里的注释，其实是一句廉价的門面話。不信，他为什么又那样不遗余力地攻击党，曲解党对知識分子的政策呢？

我們所要追求和保卫的真理，必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馬克思列寧主义。我們要發揚先进的、革命的知識分子为了實現創造人类幸福的真理，不惜“生死以之”的大无畏的精神；我們要提倡士为工人阶级而死的英雄气概。同时还必須揭穿右派分子所歌頌的一股“气”和“精神”的假象。这才能从本質上澄清这个問題。

第二，我們有些同志不善于團結知識分子，也不敢領導知識分子共同工作，对某些知識分子采取消极的“敬而远之”的态度，这是事实。这种思想和态度已經受到，而且还将繼



續受到批評。但是我們必須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薛宗元在覺察到人們對他採取“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的時候，有沒有反躬自問：為什麼人們對他採取這種態度，自己有沒有“可惡”之處？因為事情總是兩方面的。例如：你對黨員、團員和積極分子採取什麼態度？你對工農幹部採取什麼態度？你對工人和農民採取什麼態度？你對這些人是不是採取“來而不往”的態度？一句話，你的立場和世界觀，有沒有起根本變化？不少知識分子對於這些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但我們並不覺得“可惡”，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思想改造的過程。至於說到右派分子，那末你不管對他怎樣，他終是心懷不滿的，豈只是“可惡”而已。據我們所知，以“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日人的人，不是別人，正是這些可惡的右派分子。在他們的靈魂里，只有一個已被推翻的舊世界，把新社會的一切都顛倒過來了。整風運動表明，對於這些人採取“遠之”的辦法，是毫無希望的辦法，必須起來進行鬥爭。至於說到我們和大多數知識分子的關係，那末，在這個問題上，黨內的和黨外的宗派主義傾向，都必須反對，必須真正做到表裏一致，把阻礙社會主義前進的“鬼神”一齊打倒。

第三，關於物質利益和政治待遇問題，我們也要說幾句話。薛宗元說他所追求的是“政治待遇”，他並不重視“生活的照顧、物質的報酬”。因為他要的是“真理”，是“知己”。這說得多么高雅，然而又是多么虛矯。我們首先應當承認，確實有無數的既不計較物質利益，也不計較政治待遇的盡忠於社會主義的無名英雄。但也要承認有些人是既計較物質利益，也計較政治待遇的；有些人則是以爭取政治待遇作為滿足物質利益的遁辭。其實政治待遇和物質利益是一致的，沒有離開物質利

益的抽象的政治待遇。然而薛宗元的这种論調，也确实有人在咀嚼。把它揭穿，可以起強筋健骨的作用。

八

对于上述論点的批判，可能有人听不进去，甚或認為是“吹毛求疵”，不过，所有这些論点，我認為即使不是出于右派之口，也应加以具体分析，不能采取曖昧的态度，何况它已被右派分子所利用，作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資本，那就更应当加以具体分析和批判了。

薛宗元所以要标榜中国旧知識分子的这些“特点”的唯一理由，据說是我們的党不理解、“至少是不充分理解知識分子的特点，結果是：党对知識分子“信任不夠，重視不夠，依靠不夠”。为了証实这种捏造，他采取的手法是頗为巧妙的。他从兩方面极尽夸大之能事：一方面尽量夸大知識分子的优点，几乎把人类最好的品質，都写在知識分子的帳上去了。其用意很显然，不如此，不足以抬高自己的身份，不足以歪曲党对知識分子的政策，也不足以博得喜諛者的同情。另一方面，尽量夸大党在革命的道路上，在工作中所发生的某些缺点和錯誤。說什么主观主义是“內牆”，宗派主义是“外牆”，官僚主义是牆外的“鴻溝”，团员和积极分子更在牆上貼了許多教条主义的标語，甚至还在鴻溝边架起鋼絲網，禁止通行。說什么以“馬列主义者”自居，以“功臣”自居，以“高人一等”自居，以“我是改造你的”自居，以“当今舍我其誰”自居等等，总之，凡是足以聳人听聞的惡毒的語言他都使用上了。其用意也很显然，不如此，不足以丑化党的領導，不足以在政治上煽惑人心，不足以号召志

同道合者起来向党进攻。

用夸張的互相烘托的对比法，在他看起来，也許是得意杰作，可以唱凱旋之歌了。但事实証明，这是最狂妄而又是最愚蠢的作法，是別有用心的捏造。我們承認知識分子有一定的优点，但我們确实不理解被“神化”或“圣化”了的那种旧知識分子，因而也沒有象虔誠的宗教徒对待全智全能的上帝那样来对待他們。我們只知道现实的知識分子，有优点，也有缺点，我們根据党对知識分子的政策，充分重視他們在革命和建設中的作用，并依靠他們兴办各种建設事业；同时，也热誠地希望并帮助他們自我改造，克服缺点。如果要我們信任、重視和依靠反社会主义的知識分子来参加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設，那就无异“開門揖盜”。另一方面，我們充分理解自己所干的事业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前人所沒有干过的事业。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几年以来，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都获得了举世震惊的輝煌成就。但同时我們也理解到，干这样的偉大事业，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在工作中不可能沒有任何缺点和錯誤；然而这同我們革命的成就比起来，無論如何是次要的，是大純中的小疵。我們公开承認，即使是次要問題，我們也决不馬虎，决心在实际行动中加以糾正和克服。整风运动就是鉄証。

在这个問題上，我們应得的教訓是：右派分子反动的政治立場，决定了他們的思想方法，也是反动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他們对于自己的东西，全盤加以肯定，好的說好，不好的也說好，真是“癩痢头兒子自己的好”反之，对于別人的东西，对党所領導的革命事业，則全盤加以否定，尽量糟蹋，說得一无是

处。几乎所有的右派分子，都是使用这种手法，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然而这是完全脱离实际情况，脱离事物真相的胡言乱语，当我们把事实摆出来的时候，右派分子就不得不解除武装，低头认罪了。右派分子尽管漫天撒谎，但无论如何也经不起事实的考验。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而且都有主要的一面和次要的一面，决不可只看到一面，看不到另一面，决不可只抓住一点，恣意攻击或恣意推崇，而抹煞其他方面，这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有些人，所以受到右派分子的影响，并不是政治原因，而是思想方法不对头，当然同自己的立场也有关系。他们不从各方面看看事实，就盲目地跟在右派分子的后面瞎说。例如，右派分子说旧知识分子如何如何了不起，娓娓动听，恰好自己就是旧知识分子，真是“投其所好”，于是不加分析地附和起来了。又例如，右派分子说社会主义如何如何不好，也娓娓动听，自己恰恰就是富农、地主、资产阶级出身，又是“投其所好”，于是也不加分析地响应起来了。这种思想方法的特点，就叫做攻其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右派分子就是不看大的、主要的成绩，只看局部的、暂时的、次要的缺点，并且把后者尽量加以夸大，结果就把社会主义社会说成黑漆一团。可是除右派分子外，具有这种片面思想方法的人也是有的。为此，必须逐渐学会用辩证法看问题，对事对人，要作全面分析和估量，必须认识事物的本质和主流。这样才不致上右派分子的当，在实际斗争和生活中，才能避免或少犯错误。

九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没有特点呢？是有的，但并不是被右

派分子所“神化”了的特点，而是在现实社会中所产生的现实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点。

我們認為我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兩面性。一面是进步性和革命性；一面是落后性和反动性。他們在民主革命时期，曾起过先鋒的和桥梁的作用，参加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統治的斗争；但他們在斗争中又常常表現有一种动摇性，不能把革命坚持到底，其中一部分人，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有少数人变成革命的敌人。他們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接受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其中有許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馬克思主义，而且有一部分人已經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漸增多；另一方面，也有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有怀疑，有抵触，留恋资产阶级的个人民主和生活方式，倾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其中有少数人已变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知识分子所以具有这种兩面性的特点，基本上是由兩方面的原因决定的。一方面是由于我国人民在旧中国，長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知识分子虽然受到反动統治阶级的各种影响，但一般地說，也是受压迫的，也是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的。全国解放以后，他們看到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轟轟烈烈、浩浩蕩蕩，胜利接着胜利，事实証明，社会主义制度是最优越的社会制度，知识分子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能充分發揮作用，才能揚眉吐气。这样，他們感到除了跟着共产党走，別无前途。这是产生知识分子的进步性和革命性的基本原因。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級知识分

子，絕大多數是出身于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家庭，出身于勞動者的家庭是很少的；他們接受了資產階級教育，有些會直接或間接地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就是解放后才從學校出來的，基本上也受到尚未徹底改造的教師的資產階級思想影響；他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和勞動人民之間，還存在着極大的距離。這就是說，他們的資產階級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們的這種思想和社會主義思想是根本矛盾的。而且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中，他們的家庭經濟基礎，和他們原來所服務的經濟基礎一樣，已被消滅了，如果覺悟不高、立場不變，就不僅留戀過去，還會仇視新社會，這是產生知識分子的落后性和反動性的基本原因。薛宗元的家庭，就是大地主，他對土地革命，一直是心懷不滿的。

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正是根據知識分子的這種特點制定的。我們懂得，革命和建設，必須有知識分子參加，特別是文化落后的國家，知識分子是國家的寶貴財產，舊知識分子雖會直接間接地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但畢竟是腦力勞動者，和剝削階級不同，他們與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是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更重要的是他們也受到舊社會的壓迫，願意參加或傾向革命。這樣，黨對知識分子的團結，不僅必要，而且是完全可能的。事實已經證明，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許多知識分子，特別是廣大的比較貧苦的知識分子，是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參加並擁護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同時，我們又充分懂得，為了使知識分子能在革命隊伍中不掉隊，不離隊，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必須鼓勵和幫助他們克服政治上的動搖性，克服個人主義思想，樹立集體主義思想；必須改造資產階級的世界

觀，樹立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就是說，必須堅定地和工农一道，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因此，黨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和教育，不僅十分必要，也是完全可能的。事實已經證明，一部分知識分子在民主革命時期，在黨的幫助下，受到了極大的鍛煉；從社會主義革命開始到現在，大多數知識分子，在黨的幫助下，也已經有了顯著的進步。這說明黨對知識分子政策的勝利，證明這個政策是正確的，是符合知識分子的實際情況和要求的，是被大多數知識分子所接受的。

由此觀之，不懂得知識分子特點的，是右派分子，不是共產黨。如果按照薛宗元所舉的知識分子的“特點”辦事，那就只有把知識分子捧到天上去，然而掉下來則有粉身碎骨的危險。因此，必須對右派分子的謬論，加以駁斥。我們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進步性和革命性的一面，必須有足夠的估計，足夠的重視，但是如果忘記了他們的落后和反動性的一面，那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了。我們應當堅持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團結、改造和教育的政策；應當堅決執行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

十

目前的形勢，在國際範圍內；一句話，是東風壓倒西風，社會主義陣營占了上風，帝國主義陣營已遠遠地落到後面去了。在國內，人民羣眾在共產黨的領導下，1956年取得了經濟戰綫上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決定性勝利，1957年經過全民整風和反右派鬥爭，又取得了在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同時又超額完成了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

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目前，全国人民为十五年内
在工业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正在为提前
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一个大跃进的生产高潮已经
形成。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新形势。在这样一个令人无限振奋的
新形势下，应该如何使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工作与形势相适应，
这是知识分子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

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必然引起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
分野，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的分野。以目前的情况来说，左派
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右派则反对
走社会主义道路，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中间派则常常动摇于
两者之间，它的动摇程度，又常常取决于两条道路斗争的胜负
程度。在整风运动中，已充分表明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这种分
野。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知识分子必须力争当左派，也就是
力争当革命派，才能在政治上适应当前新形势的发展，才能使
自己迈步前进。

在实现党的一个重大的政策和措施时，必然引起人们在
思想上的分野，先进与落后的分野。例如，在目前的大生产高
潮中，具有先进思想的人物，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
干劲，主张多、快、好、省，不怕任何困难，向大自然进军，在生
产战线上已经创造并正在创造奇迹。反之，具有落后思想的人
物，则是官气、暮气、骄气、娇气重重，对于落后的状况安之若
素，还在照所谓常规办事，遇到困难，不想克服，束手待俘。他
们的脑子，是右倾保守思想的巢穴。在先进和落后两种思想的
斗争中，知识分子应当力争前进，反对后退，使自己成为一个
促进派。右倾保守思想，是知识分子应当特别警惕的。因为他

們自以為有“本領”，脫離羣眾，看不起也看不到人民羣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他們只注意書本知識，脫離實際，看不見客觀的革命形勢的發展，他們受到沒落的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很深，喜歡按常規工作。一個一心只讀數理化，兩耳不聞窗外事的人，一個驕傲自滿的人，一個習慣於唱高調子的人，是註定要產生右傾保守思想的。

力爭做革命派，力爭做促進派，這就是每一個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奮鬥目標。為此，必須繼續進行思想改造，必須在世界觀上來一個根本的轉變，逐步地拋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而樹立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原來為知識分子所服務的舊的經濟基礎，現已消滅，那末，為了生存和更好地工作，就應當毫不遲疑地依附工人階級，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這個客觀存在，就是毛主席所指出的，大量知識分子的世界觀不但有了改變的必要，而且有了改變的可能。能夠正視這個客觀存在，並且努力這樣做，就可以使自己成為革命派、促進派，否則將成為它的反面人物。

思想改造是多方面的，從目前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形勢看來，從知識分子改造的途徑看來，除了應當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應當在全民整風和反右派鬥爭中，從政治上思想上進行鍛煉外，還必須到勞動中去，切切實實地鍛煉自己，這是當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根本道路。只有直接參加體力勞動，才能真正解決知識分子和工农羣眾相結合的根本問題。毛主席老早講過：“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农羣眾相結合”。願意並且實行和工农結合的，是革命派、促進派，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

动派、促退派。要实行知識分子和工农結合，經驗証明，單靠理論上的理解，是完全不夠的，必須投身到工农羣众的劳动中去，才能更有效地解决这个根本問題。只有知識分子和工农羣众團結起来了，才能很好地体现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結合、个人才能和羣众智慧的結合。知識分子往往輕視体力劳动，以为腦力劳动最可貴是决定一切的东西。其实，腦力劳动是从体力劳动发展起来的，是把体力劳动的創造記錄下来、集中起来的劳动。体力劳动是基础，沒有体力劳动就沒有腦力劳动。而且，任何劳动，归根到底，都必须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工人和农民的劳动，是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劳动，腦力劳动者必須为工人、农民服务。为了服务有成效，就必须使这两种劳动的結合，体现出来。現在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数缺乏生产斗争、階級斗争的鍛煉，他們輕視、鄙視体力劳动，他們忘本了，应当在劳动中好好改造思想。我們应当重視知識分子的个人才能，革命和建設都需要他們的才能。但同时我們又始終認為个人才能是羣众智慧的集中，如果脫离了羣众智慧的基础，那就象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样，决不可能有发展前途。因之，个人的才能必須与集体、与羣众智慧相結合，才能使这种无限的精神力量变成偉大的物質力量。如果夸大个人才能，輕視羣众智慧，那就是資產階級个人主义的知識分子。而許多右派分子，正是从这种个人主义中发展起来的。

努力学习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特别是通过劳动鍛煉，力爭做一个革命派、促进派，也就是說，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我認為这就是知識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所應該走的道路。

反对右派分子破坏我們学校的 劳动教育

蔣 怀 諫

一、劳动教育是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向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中的一个經常的基本内容。

我們的国家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目前正处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将来还要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是要依靠全体人民的劳动才能建立起来的。因此，劳动是英勇、光荣和豪迈的事业，劳动人民是最受尊敬和重视的。作为培养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者的普通学校教育，不仅要教育学生懂得现代科学知识与基本生产原理，同时还应教会他们把这些知识与原理运用到劳动实践中去。偉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教导我们：“不把青年一代的教学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①因此，劳动教育的正确实施，不仅表明一个国家政权的性质，而且关系未来社会的前途。

几年来我们对学生实施全面发展的教育，教育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我们究竟要培养怎样的人，过去还是不够明确的，学校教育忽视政治和脱离生产的倾向很严重。毛主席提出了“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等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②这就使学校教育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很明显，学校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学生学习的目的

就是为了更好地参加劳动。但是，这种思想的转变，对于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深受资产阶级教育影响的学生来说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因此，劳动教育的实施，就成为学校向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一个经常的基本的内容。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完全站在与社会主义敌对的立场来看劳动教育，他们千方百计地找寻借口、制造邪说，企图取消劳动教育，贩卖资产阶级教育，为资产阶级培养知识分子，这是我們絕不容許的。

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找寻借口、制造邪说，肆无忌惮地歪曲和破坏劳动教育。

从全省教师反右派斗争中所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大都对劳动教育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们破坏劳动教育的手段是极其阴险毒辣的。首先，他们明目张胆地从正面来攻击劳动教育，说劳动教育是形式主义，中小学毕业生主要是升学而不是劳动，中小学毕业生参加生产劳动不合算、不光荣等。其次，他们感到正面攻击难以奏效，于是就歪曲事实找寻借口从侧面来攻击，说进行劳动教育会妨碍教学，引起忙乱，妨碍教育质量的提高；叫嚣农村生活苦，并以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来诱骗青年学生。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说：“劳动教育是形式，没有向学生进行的必要。”他们集中地攻击了劳动教育补充教材、学校里的种植等活动、学校和社会进行的宣传工作以及各地党政领导

① “列宁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20页。

② 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8页。

对今年中小学毕业生采取的具体安排，他們把我們向学生进行劳动教育的具体措施說成是形式主义的化身，煽动学生来反对。例如南寧一中的右派分子梁焜然公开宣布劳动教育补充教材是形式主义，当他向学生講到这些教材时，說：“这些都是进行劳动教育的，不用說你們都知道。”只唸一遍就算了。学生在他的影响下，对劳动教育的抵触很大。劳动教育是形式主义嗎？我們認為这种說法是沒有根据的。辯証唯物主义認為客观世界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容和形式，二者是統一存在的，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也积极地影响着内容，沒有形式的内容是不存在的。我們今天向学生进行的劳动教育，是共产主义教育的一个組成部分，是为了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以便將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服务，这就是劳动教育的基本内容。国家制定的有关劳动教育的方針政策以及我們編写的教材、組織的种植等活动，都是由这一内容决定的，沒有这些教育的組織形式，就不可能促进劳动教育内容的实现；同时，我們所进行的劳动教育也是针对目前不少中小學生輕視体力劳动、輕視劳动人民、缺乏生产基本知識这一事实出发的，所以認為劳动教育是形式主义，这就是在本質上取消劳动教育。

資产階級右派分子又認為中小学毕业生主要任务是升学而不是劳动。他們在学生中散布“不能升学就是失业”的謬論，故意片面地鼓勵学生去升学，对劳动教育采取消极的态度。平乐中学的右派分子經常对学生說：“你們不努力就要回家去生产”。南寧一中右派分子梁焜然对学生說：“上級拿政策来压你們，我不忍心，不压你們，上級又責怪我，我做班主任夾在中間

真難。”在他們的影响下，也有不少認識模糊的教師認為學生考不上學校就丟臉面。學生惟恐考不上學校沒有出路，便日以繼夜地趕功課，拒絕參加任何社會活動，結果不但沒有提高反而妨礙了自己的進步。中小學畢業生的主要任務是升學而不是勞動嗎？不能升學就是失業嗎？我們的看法完全不同，我們認為中小學畢業生除了少數升學外，其餘多數都應該參加工農業生產。因為“普通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養忠實於社會主義事業的，有相當文化水平的，身體健康的勞動者，其次才是為培養專門人材打好普通知識的基礎”（見薄一波副總理報告）；同時要使所有的小學畢業生都升到中學去，所有的中學畢業生都升到大學去，事實也是不可能的。此外，還應該認識升學也就是為了更好的勞動，而不是脫離勞動，不勞而獲；那種認為參加工農業生產就是失業的看法，本質上就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和“學而優則仕”的錯誤思想。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還在學生中散布“中小學畢業生參加工農業生產不合算和不光榮”“工農業生產用不着這樣的‘文化’”“讀了中小學還去種田未免太不光榮了”等論調，我們認為這種說法也是荒謬的。我國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雖已完成，但農業技術還很落后，農業生產水平還不高，農村迫切需要有人。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既符合發展農業生產的需要，又利於廣大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所以根本不存在合不合算的問題。至於光榮不光榮那要看每個人對勞動的態度，因為社會主義事業，只有不同的分工，而沒有政治地位的差別。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還從側面來攻擊勞動教育，他們硬說“勞動教育會妨礙教學工作，引起學校的忙亂。”“勞動教育會

影响教育質量的提高。”梧州一中右派分子崔燦然在上級提出要進一步加強學校的政治思想教育，特別是要以勞動教育為中心時，便在教師中煽動說：“上級過去是壓倒，現在每個都是加強，這樣就會削弱教學質量，現在活動多，加強了政治思想教育，使學生沒有時間復習。”荔浦中學右派分子說：“教育質量低下主要是勞動教育的結果。”因此，他們反對學生聽報告，反對學校開設農業課，消極地對待學校養豬、種菜等課餘勞動。我們認為這種看法是非常荒謬的，首先應該看到，我們的教育質量是在不斷提高的，同時，教育質量的提高，並不是僅僅表現在學科知識質量方面，它還表現在學生共產主義道德品質的成長和體質的增進方面。因此，加強勞動教育不但不妨礙教育質量的提高，相反的正是提高了教育質量。而且，只要我們在向學生進行勞動教育時能堅持一定的原則和遵守一定的制度，有計劃、有領導地進行，那末絕不會使工作忙亂的。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還有一個破壞勞動教育的“法寶”，就是一方面叫囂農村生活苦，一方面宣揚資產階級腐朽的生活方式，從而煽動學生反對黨和政府關於組織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的措施。從各地揭發出來的材料看，許多右派分子都很會用這一個“法寶”，同時也確有一些覺悟較低的學生被他們拉過去了；例如南寧一中右派分子梁焜然就經常在教師中說：“農村生活苦，沒有米，沒有油，叫我怎樣去說服學生呢？”並以逛街、跳舞、上茶社、請客等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來引誘學生。當中共南寧市委動員今年中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時，該校 21 班不少學生在梁焜然的慫恿下竟聯名寫信給南寧市委並包圍校長室表示反對，這是一個嚴重的教訓。農村生活真

的很苦嗎？难道因为农村生活比較苦就不動員學生回鄉生產嗎？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报告中說过，許多人說农民生活苦，这种意見就一方面說來是对的，由于我們在解放前長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剝削，人民生活很痛苦，现在解放了，但还要几十年時間，經過艰苦的努力，才能把人民生活逐步提高，这样說苦就恰当了。另一方面來說就是不对的，解放以来，农民免除了地主的剝削，生产逐年发展，农民生活已有了一些改善。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列举了許多具体事实來說明广大人民（包括工农）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关于工农生活差別的問題，周总理指出这是由于历史条件、城乡不同的生活条件，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虽有差別，但不太悬殊。这就是向学生进行說服教育再好不过的理論根据。至于个别地区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生活較苦，只是暫时的問題，何况教育青年学生在困难的环境中艰苦奋斗，正是我們教育者的职责，同时也是青年学生应有的高貴品質。我們不能設想大家不去农村，大家不搞农业生产，而能够增产粮食、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右派分子这种謬論是不值一駁的。

三、坚持社会主义原則，把劳动教育認真貫徹下去。

「資产階級右派分子破坏劳动教育并不是他們的直接目的，而是以之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手段，因为他们深知劳动教育是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部分，是培养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接班人的帶有根本性的工作。拥护劳动教育与反对劳动教育的斗争，本質上也就是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兩条道路的斗争在这一具体問題上的反映。我們必須坚持社

会主义原則，把劳动教育認真地貫徹下去。

首先，要加強学生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用社会主义思想来教育学生，以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蝕。目前特別要注意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与社会斗争实际进行教育，集中解决当前的一些重大問題，如农业合作化問題、劳动教育經常化問題等，以便在他們的思想領域內扩大社会主义思想陣地。我們教师应努力学习馬列主义理論，加強自我改造，逐步学会在一切教学活动中运用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原則問題。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时，应注意培养他們准备为建設社会主义参加平凡的劳动的決心，使他們有明确的政治方向，懂得为谁服务，这样，劳动教育才有思想基础。因此，我們認為做大报告講大道理、上农业課談生产知識以及适当的參觀、訪問、座談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应注意組織学生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是一个長期的艰苦的过程，对于学生，我們不仅要給他們一定的理論知識作为認識事物的思想武器，同时还要指导他們参加經常的劳动鍛煉，只有这样才能培养他們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才能彻底克服旧社会的輕視体力劳动、輕視劳动人民的残余思想对他們的影响，从而使他們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因此，我們必須本着教育与生产相結合，知識与劳动相結合，腦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結合的原則，把組織学生参加体力劳动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

关于教师負担問題

——駁斥土光对北京市小学教育工作的誣蔑

北京市教育局小教科長 周 正

右派分子在小学里点火一般都抓住这样几个題目：什么小学教师社会地位低呀，待遇微薄呀，工作負担太重呀等等。他們都裝成同情和爱护小学教师的樣子替小学教师“請命”，借此向党发动猖狂的进攻。土光跟他們一样，也抓住这些題目大做文章。他以首都小学做例子，在1957年6月2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迫切需要解决小学教师負担过重的問題”的文章，亟尽煽动的能事，猖狂地向党进攻。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正是右派分子得意忘形，向党和政府进攻得最猖狂的时候。土光在文章里說：目前小学教师負担很重，工作時間很長，以致不少教师累病了。原因有三：一是教师非教学活动多，二是教师事务工作多，三是編制小、要求高。三点中他認為最主要的是編制太紧。

土光的文章发表后，在北京市小学中引起了一场很大的风波。学校里对他的文章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拥护土光的看法，認為只有土光才“了解”小学教师，替小学教师“說了話”，特别是少数工作态度不好的教师更是拍手叫好，因为他們从土光的文章中找到了可以不好好工作的合法根据。因此，土光的文章給教育工作带来了許多困难，造成了非常坏的影响，文章发表后，对“負担重”的“呼声”突然高了起来。另一种是反

对土光的看法。許多行政干部和教师从三方面駁斥了土光的对事实的歪曲。

第一，土光故意夸大事实和不惜捏造事实来说明小学教师的负担过重。土光說：小学教师的负担日益过重和健康状况的日益下降，已形成“恶性循环”。一般小学教师的工作量每天长达十二小时以上，部分教师有长达十五、六小时的。“不少小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教师患有肺病、神經衰弱、关节炎、貧血、高血压等慢性病，每所学校經常有兩三位以上的教师請病假”。这些夸大，不用調查就可以了解。如果一个人每天做十五、六小时工作，余下的八小时再除了做些必要的事情，如走路、吃飯、料理家务等，每天恐怕只能睡四、五小时了！如果真是这种情况，小学教师还能活到今天嗎？他又說：不少教师因为工作累，得了关节炎、貧血等疾病。这更是胡說，关节炎与工作忙有什么关系呢？他还进一步造謠說：每校經常有兩三位教师請病假。北京市有一千多所小学，其中有310所只有一个教师，請問土光，这些学校多出的一兩個病号在哪里？其次，北京市还有几百所三、四个教师的小学，按照土光的說法，这些学校就要經常处在停課状态中了。就是在一些大型学校里，也沒这样多病号。去年春天病号較多，那是因为当时鬧流行性感冒，难道濾过性病毒也发源于工作忙不成？总之，他要說明的是新社会里教师的工作有如“奴隶劳动”之悲惨和痛苦罢了。

再看他更进一步的“創造”吧：“教师連上几堂課后，就精疲力尽，坐在硬板凳上喘气，腦子发昏发脹，有些教师还在上課的时候晕倒在教室里”。教师上完課后有些累是事实，但腦子发晕发脹只是个别的。至于有些教师累得晕倒在教室的事，

在解放前倒听說過，恐怕土光是有意地想把它按在新社会里吧！土光还說：“不少教师連飯也不能准时吃，到开会或者学习的时候，就只能无精打彩，強振精神，有的就睡着了”。这样的教师是个别的，这种个别教师中，还有一些是不問政治、不爱学习的。他又說：“有些教师晚上工作，精神支持不住，就用冷水冰脑袋，用万金油涂眼皮，用手捶大腿来刺激神經兴奋，坚持干到十二点、一点、兩点”。这一段，更故意夸大，好象共产党对教师是在搞强迫劳动，罰苦工。

事实上，小学教师的工作和健康狀況到底如何？我們認為，小学同党所領導的其他部門一样，大家都在积极地工作。一般教师的工作量，根据我們的調查，多数人每天工作量不是在12小时以上，而是在八小时到十小时之間，少数人才达到12、13小时，但不是經常的，这多是工作态度好，而水平較低的教师，或孩子多的女教师。此外有少数不負責的教师，工作量根本达不到八小时。教师健康狀況不好是事实，但得病人数并没有他說的那么多，而且得病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我們調查的結果，教师生病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解放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老病；二是小学女教师多，有些人生孩子較多，因此身体不好；三是部分教师与工作忙有关系。特別要指出的是，小学教师在解放后由于职业穩定了，生活改善了，健康狀況已有好轉。而土光却把教师的健康狀況說得很坏，把生病的原因說成完全由于过分劳累，这是一种惡毒的歪曲和誣蔑。

第二，教师工作忙的原因是什么？怎样对待这种忙的現象？我們同土光的看法也不同。

目前首都小学教师的工作是辛勤的，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认为是好事，这正说明了教师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很高。而土光却认为是坏事，是不正常的，他对解放后小学教师的辛勤劳动，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充满了不满。他宣传的是资产阶级的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的思想，实际上是对积极工作的教师散布消极因素，同时也鼓励了懒汉。

小学教师工作较忙的原因，除上面提到的解放后教师的积极性提高了以外，我们觉得很重要的因素是小学教育事业发展很快，新教师大量增加的结果。1949年北京市小学只有教职员2,400多人，现在有11,000多人，增加了四倍多。这些新教师大部分没上过师范，自然在工作和学习上就要花出很大的精力。其次，几年来工作的要求是逐渐提高了，也逐渐全面了，特别是1954年市委发布关于提高中小学教学质量的决定以后，正象土光文章里提到的：“教师要全面关心儿童”，教学方法也要改进。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工作如何会不忙呢？但这些因素，土光都是不赞成的。在他的脑子里，只有一点，那就是教师工作忙，全是你领导得不好，你们根本不关心小学教师。

此外，他为什么紧紧抓住教师负担重，并且把主要原因归结于小学编制紧呢？关于现行小学编制，我们认为基本上是合理的，只在部分年级和部分学校中有些问题。但土光硬说小学编制是全面的紧，全面的不合理，他甚至捏造北京市农村小学的编制比例，说：“农村许多小学没有职工工资”，他是想借此向中央教育部、国家计委、国家编委将一军。他恶毒地咒骂中央教育部“只懂加法，不懂减法”，后来又说教育部是懂减法的，加了工作后又减了编制。这不是什么懂不懂减法的问题，

这正是猖狂地向党向政府的进攻。

第三，小学教育的成績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土光虽然没有直接涉及这个根本問題，但是，他却侧面地接触了这个問題。他采取迂迴的办法一笔抹煞几年来的成績。就拿減輕小学教师負担的問題來說，从1952年开始，在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委的关怀和领导下，小学的忙乱現象已大为減少，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这点土光是知道的。但是他却只字不提，这难道不是讓人們以为党和政府不关心教师，只有土光才关心嗎？此外，他把我們所取得的成績都說成是教师負担重的原因，从而加以否定。他說：“在教法方面也是变化很多，1954年反对串講，改成用談話法教学，以后又要求教师能有表情地朗讀，指导复述，加強教学中的語文因素……”。在教学改革方面我們确有不少缺点，但是他把我們“要求教师能表情地朗讀，指导复述，加強教学中的語文因素”等等語文教学的任务，都說成是造成負担重的因素而統統加以反对。

在学生品德教育和校外教育方面的成績，他也是一概否定的。比如他說教师負担重的原因之一是：“教师要全面关心兒童的成長，这是應該的，問題在于要教师全面負責，孩子上課要管，下課后游戏也要管，孩子的課外活动要管，校外活动也要管，学生在学校里上自习要管，回家在家庭学习小組内温課也要管……”在这里看起来彷彿土光是贊成教师对学生全面“关心”，而只反对全面“負責”的，其实他是玩弄文字。把教师对学生課上課下要管，校内校外也要管都反对掉了，还有什么全面“关心”呢？

几年来，首都小学挖掘学校設備的潛力，适当扩大班級

名額，曾用扩建和改建校舍等办法多招收了一部分学生入学。在我们看来，这项工作正是贯彻中央勤俭办学的方针的成绩，但是土光却借“妨碍学生眼睛和肺部的健康”为“理由”而加以反对。

以上这些改革和改进，在土光看来，不但不是成绩，反而给教师造成了负担过重的灾难。土光的歪曲和诬蔑，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抹煞一切，“今不如昔”的调调没有两样。

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我们同土光还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他在否定了社会主义小学教育的成绩的同时，也否定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方针、政策、制度和办法，难道他向往的还不是旧中国的或者资本主义教育的那一套吗？

我们教育局的工作，确有许多缺点，给教师工作带来了不必要的负担，这正是我们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与土光不同，我们是为改进工作，搞好社会主义的学校。土光却是用夸大个别事实和不惜捏造事实的办法，企图把教师的负担完全归咎于党和政府的领导，从而抹煞小学教育的成绩。这绝不能认为只是土光的思想方法有片面性，必须指出，他是别有用心的。他想利用整风的机会，在小学里点一把火，煽动教师对党和政府不满，以实现其反党阴谋。

駁斥林汉达的反党謬論

董純才

右派分子林汉达有成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这里駁斥的只是他在5月21日统战部座談会上发言中的两个反动論点。这就是：一、“教育部有职无权”；二、“教师在社会上没有地位”。

說“教育部有职无权”，这完全是造謠。事实上教育部是有职有权的。国家赋予教育部的职权是不小的。現行一般教育法規，如中小學校、师范學校規程，中小學校、各級师范學校的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都是教育部制訂頒布的。为了指导各地教育工作，帮助解决工作問題，教育部每年都召开一些專業會議，每年发布公文好几千件。各地教育行政部門都是按照教育部頒发的教育法規、工作指示和會議的精神和決定去布置工作的。各地的工农业余教育工作也是如此。如1956年各地制訂扫盲工作規劃，就是按照1955年年底教育部召开的計劃工作座談會的精神做的。职工扫盲規劃就是按照高教部、教育部联合召开的职工业余教育會議的精神和規定制訂的。各地教育行政機關都經常向教育部請示报告工作，要求帮助各地解决各种工作問題，每年給教育部的公文也有几千件。各地教育行政機關对教育部发布的教育法規感觉需要更改的时候，都要請求教育部批准。甚至各地設置高等师范學校，按照規定應該

由国务院批准，但是各地政府在筹建高等师范学校的时候，往往是先来和教育部商量，征求教育部的同意，然后才呈請国务院批准。这些都說明地方教育行政机关甚至連地方政府和党委都是很尊重教育部的职权的。由此可見，林汉达說“教育部有职无权”，說下边不理睬教育部，完全是造謠。

現在要問，身为教育部副部長的林汉达为什么竟抹煞事实，顛倒黑白，有意造謠呢？

他的用意是在攻击党，反对党对教育工作的領導。关于有职无权的問題，他說：“我不是說我本人有职无权，而是說連教育部在某些工作上也是有职无权。比如：教育部所发的指示，下边是很少理睬的，使得我們一定要爭取国务院发指示，甚至还要爭取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指示。”我問过林汉达，你說教育部有职无权，究竟指的是什么事？他說，扫盲不是教育部提出的，糾正扫盲工作偏向，也不是教育部提出的。他的意思就是說这些都是党中央提出来的。这岂不是党代替包办了教育部的工作么？是的，扫盲的方針任务和糾正扫盲工作的偏差，都是党中央提出的。这些都是事实。現在要問，党中央对教育工作，包括扫盲工作在內，难道就不應該过問，不應該領導么？

在我們看来，象其他政府工作一样，教育工作包括扫盲工作在內，應該受党的領導。党有責任过問教育工作，并且必須把教育工作領導起来。而林汉达象其他右派分子一样則認為党不應該領導政府工作，不應該領導教育工作。这就是我們跟林汉达及其他右派分子之間的根本分歧点。

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理論和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實踐，都

告訴我們一條普遍真理，這就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要通過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的領導來實現。簡單地說，搞社會主義事業，就必須要依靠共產黨的領導。

也許林漢達會狡辯說，共產黨的領導我是擁護的，但是不能“黨政不分”，不能“以黨代政”，否則，“政府有什麼用呢”？黨並沒有代替政府管理日常行政工作的任務。黨從來就反對代替包辦任何非黨機構的活動。但是必須明確指出，憲法已經明文規定了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我們的政權工作必須受黨的領導，這是實現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根本條件。如果說政權工作不要黨的領導，那還談什麼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由黨來領導政府制訂政府工作中的各項方針政策，並且力求保證它們的正確實施，這決不是以黨代政或黨政不分。這正是體現黨對政府工作的領導作用。在方針政策製成之後，並且已經國家機關討論通過，變成了政府的方針政策，那當然應該由政府來負責貫徹執行。就是在貫徹執行中，也還要依靠各級地方黨組織在羣眾中做思想政治工作、宣傳動員工作，以保證政府的方針政策的正確的貫徹執行。政府各部門的工作都是如此。教育工作，包括掃盲工作，當然也不能例外。老革命根據地和新中國成立後八年來的經驗，都證明了人民政府工作之所以獲得巨大的成績，受到人民的擁護，是跟黨對政府工作的正確領導分不開的。

也許林漢達要說，黨反對代替包辦政府的行政工作，那又何必由黨中央出面發布指示、決定呢？關於這個問題，今年7月18日人民日報的社論“黨不能凌駕施令嗎？”已經明白地

作了回答。周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說到这个问题，他說“党对人民羣众直接发出政治上的号召和政策性的决定，对政府工作不但沒有妨碍，而且有很大的帮助。”这不只是体现党的领导的一种形式，不只是由于党在整个国家工作中处于领导地位，負有领导責任，同时也还由于党在人民中間享有很高的威信。因此，由党单独或党同政府联合发布一些政治号召和政策指示性的决定或帶有羣众运动性需要党政一齐动手的工作指示，对推动工作，完成任务，有极大的好处。例如：象扫除文盲这样一件有关文化革命的大事情，这样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由党中央和国务院頒布联合决定，这正說明党和政府是多么重視这件工作。它本身对开展扫盲工作就有一种鼓舞、推动的作用。在我們看来，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和正确的，也是全国人民和广大教育工作者所热烈欢迎的。但是林汉达对这件事情却偏偏抱反对态度。

林汉达反对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并不是偶然的。几年来，在日常工作中，时常同我們发生爭論，这些爭論不是一般爭論，往往是如何貫徹执行党中央对扫盲工作的一些重要方針政策性的指示的爭論。例如中央在1953年春和1956年夏先后兩次糾正扫盲工作的急躁冒进的偏向。我們要坚决貫徹执行这个指示，而林汉达都是反对的。又如中央总是指示开展扫盲工作要走羣众路綫，要实行“以民教民”，識字課本應該由地方結合地方情况編，而林汉达都是反对的。这說明在教育工作中，我們主張貫徹执行党的政策路綫而林汉达則是反对的。

我們知道，林汉达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他說过：“中国搞資

本主义的經驗都沒有，怎么能搞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必然要反对党的。从林汉达在日常工作中反对党的教育方針政策到最近有意造謠誣蔑攻击党，这些事实都說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林汉达是一貫反对党的领导的。

林汉达說：“教师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不被重視，这种情况很普遍。有人說小学教师低人一等，想不到比小学教师更低的还有业余教师，业余教师是低人二等。”还說“领导不重視工农业余教育。”在这里必須弄清楚三个問題。第一林汉达所說的这种现象是不是符合实际。如果有这种现象，它的产生的根源是什么？第二这跟党的政策有什么关系。第三林汉达說这些話的用意何在？

不可否認，在某些机关，在某些干部中是有不重視工农业余教育的偏向的。在社会上也是有些人不重視教师的。但是林汉达却夸大了这种现象，把个别夸大成一般，把局部夸大成为整体。應該說产生不重視工农业余教育和輕視教师的現象的根源，还是剝削階級輕視工农教育和教师的思想的影响。这正是党和政府所反对的东西。这同党和政府的教育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是根本相違背的。大家都知道，在旧中国，反动政府是根本不注意办工农业余教育的，那时候有一些所謂“民众教育”事业，那不过是个点綴品，騙人的幌子。在解放前，在中国的土地上真正广泛办工农业余教育的是在解放区。教育为工农服务，学校为工农开門，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一条根本教育方針。全国解放后，工农业余教育就变成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工厂到农村已經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农业余教育網，有好几千万劳

动人民在識字学文化。这怎么能說党和政府不重視工农业余教育呢？

再从知識分子政策說，党和政府一貫都很重視知識分子，教师(包括小学教师和业余学校教师)并不例外。正是因为如此，新中国教师的地位和旧中国教师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解放前，小学教师和民众学校的教师是没有什么政治社会地位的，是受反动統治階級歧視和压迫的，生活是很苦的。解放后，教师跟工人农民一样翻了身，作了国家的主人翁，有了自己的組織——教育工会，被人尊称为“人民教师”，在各級人民代表大会中都有人被选为代表，在全国政协和省、市政协委員中也有教师代表，很多人被选为劳动模范、优秀教师。例如北京市业余学校教师被选为市人民代表的就有五人。这些事实都說明教师(包括小学教师和业余学校教师)在新中国是怎样受到尊重，享有榮譽。这样的政治社会地位岂是旧社会所能得到的么？这怎能說小学教师低人一等，业余教师低人二等呢？

再說小学教师和业余教师的工資待遇，那也是在逐年提高，他們的生活也在逐步改善。除了工資以外，教师跟其他方面的工作人員一样，还享受生活福利的待遇。这也是旧社会所沒有的事。至于业余学校教师的工資待遇，按政府規定一般都按照中小学教师の工資标准評定。北京市小学教师的平均工資，每月57元，而业余学校教师每月是58元。这怎么能說业余学校教师低人二等呢？

事实既是这样，身为教育部副部長的林汉达，为什么竟这样歪曲事实，混淆是非，說教师在社会上沒地位呢？为什么他

儼然裝作教師代表的樣子來為教師發出“呼吶”呢？他的用意究竟是什麼？明眼人不难看出。林漢達的用意不是別的，而是借此誹謗黨，攻擊黨，挑撥離間黨和教師羣眾的關係，煽動教師反對黨，同時又企圖抬高自己，拉攏教師，爭取教師跟着他走，跟着資產階級右派走。

剝開皮來看，造謠誣蔑黨，反對黨對政府工作的領導，煽動教師來反對黨、脫離社會主義的道路，爭取教師跟着林漢達，跟着資產階級右派一起走資本主義的道路。這就是林漢達所說“教育部有職無權”和“教師沒有地位”這兩個反動論點的實質。

俞子夷的政治立場和教育思想 是一貫反動的

祝 其 樂

俞子夷的言行是一貫反動的，是有長遠的歷史根源的。為了進一步揭露他的反動言行的歷史根源，也為了促使他本人進行自我改造，特根據他解放前的部分著作，對他一貫反動的政治立場和教育思想作一些揭發和批判。

一個真誠擁護社會主義的舊知識分子和教育工作者，必須對自己過去反動的政治立場和教育思想不斷地進行檢查批判，才能求得徹底的改造。但是，許多事實證明，俞子夷在解放以來，自命進步，認為已經改造得差不多了；其實，他根本沒有獲得改造，而是繼續堅持反動的政治立場，特別是在鳴放期間，積極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活動，並且繼續傳播曾經

为蒋介石反动政府所賞識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现在就以下三方面加以揭发和批判。

(一)他的政治立場是反动的

俞子夷一向狂妄自大,对党、对苏联,不惜捏造事实,誣蔑打击,还說是“脾气如此”。但是,他对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却百般恭維,万分忠順。

1. 先說他对待国民党反动派的态度。他在“怎样做教师”一書中,竭力向青年教师歌頌国民党反动派。他写道:“政治家是人民的公仆,也就是民众的领导者,他們能使穷弱的国,变成富強;能使紛乱的国,变成統一;能使不平的人,变成平;能使被压迫的人,变成自由。功績的偉大,当然可以說在無論那一种以上。”接着他又暗示教师必須去帮助“政治家”,并以能成为他們的“靠托”而“自豪”。他說:“不过政治家所頂要靠托的还是教师……治国者若沒有教师替他們帮忙,可以說必敗无疑。不出名的教师,暗暗中实操国家安危,民族兴衰的大权呢。这不是可以自豪的嗎?”

大家知道,当时的“政治家”、“治国者”不就是万惡的蒋介石反动統治集团嗎?歌頌它,并欺騙广大青年去維持国民党反动統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态度呢?

以上是俞子夷在1934年写的文章,我們再来看他在1945年写的教育杂文中的一段話:“照統計定律,特別好官只有四分之一,一般好官約居半数,劣等官也不过四分之一。……許多劣等官自己并不劣透,唯一缺点是糊涂,被家里人,手下人蒙蔽着,仗势欺人。”这就是俞子夷对国民党反动統治集团所

作的分析。照他的看法，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官僚，絕大部分是好的，就是四分之一的劣官也并不劣透。这难道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嗎？俞子夷如果不是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立場上，就决不会作出这种荒謬絕倫的估計。

2. 現在，我們来看俞子夷对美帝国主义的态度。他对美帝国主义的态度，实际上是一种奴才对主子的态度。他在“怎样做教师”一書第四章中，講到前几年有个菲律宾的教育家来上海、苏州、南京等地参观，也参观了他所主办的南高附小，对学校有所指責，叙完这件事以后，他写道：“我們受过美国人的贊許，反过来受由美国人教出来的菲島人的气，心上着实有些不甘心。”这句话表明他以受过美国人的贊許为光荣，他同菲律宾人的矛盾也不过是奴才和奴才之間的冲突。更加无耻的是他在提到菲律宾人写文章批評中国教育以后，又洋洋得意地說道：“他对于我却还有若干好感。”这不仅是自我吹嘘，而且是缺乏民族意識的表现。

俞子夷不但有严重的崇美思想，而且公开表示中国应该接受“美援”。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他在“教育复員”这一篇杂文中肯定地說：“租借援助确是促成这次胜利的一因。今后复員尚須盟国救济，也是无可避免的事实。”

这里所指的“盟国救济”，当然就是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誰都知道，所謂“租借援助”、“盟国救济”，都是帝国主义使我国殖民地化的毒辣手段，但是俞子夷竟把它看作抗战胜利的原因和战后复員必不可少的条件。

俞子夷在“旧金山會議和教育”一文中还講过这样几句话：“無論人与人相处，国与国相处，都决不会只有一方面是

完全对的。”很明显，这些话是在替帝国主义进行战争和掠夺作辩护。试问：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人民起来反抗，是否也“决不会只有一方面是完全对的”呢？

这些事实，证明了俞子夷不但没有半点起码的反帝思想，而且早已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了。

3. 再从他对当时学生运动的态度，进一步说明他的政治立场。俞子夷写“怎样做教师”这本书是在1933—1934年，那时（九一八事变以后）是国难日深，全国人民正热烈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凡是有良心、有血气、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人都积极参加这个运动。但是俞子夷却千方百计地诬蔑和抵制这个运动。他在这本书中以十足反动的态度写道：“再进一步，有的风潮不是学生主动，学生背后，有别有作用的主使人物，在那里捣乱。他们利用学生心理上的幼稚，利用学生不容易自制的弱点，而激动风潮。”接着，为了效忠反动政府，他又提出了“以逸待劳，以静制动”“防患未然，消弭无形”等对付学潮的巧妙方法。

（二）他的教育活动是反共反人民的

俞子夷的反动政治立场还贯穿在他的教育活动的各个方面，他的教学活动就可以证明他是反共反人民的。俞子夷在解放前40多年间，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是一贯忠诚的，他竭尽一切力量在教育工作方面为反动政府效劳。远在五四运动前后，俞子夷已成为江苏学阀的骨干分子，被派到美国去考察教育，回来就担任南京高师教授兼附小主任。当时江苏学阀凭借北洋军阀的势力，控制东南各省的教育阵地，俞子夷就

是小教方面的主將。1926年他到浙江之后，就投靠国民党西山會議派，担任第三中山大学初等教育处长，利用地位，安插私人，积极推行实用主义教育和設計教学法。1929年中山大学結束，他留在浙大教育系，政治上轉向国民党CC派，經常在极端反动的东南日报上发表文章，和特务头子胡健中、許紹棣等往来密切，担任国民党浙江执委第五、六届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員。1946年仍教育部委任他为国民教育实验区主任，并因成績优良，傳令嘉獎。抗战胜利之后，他对国民党反动派表示：“战后建国确是我从头努力的絕好机会。……願將老弱殘軀，再跟你們共作十年。”大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气概。

那末，他这样再接再厉，在教育工作方面究竟干了些什么？为的又是什么呢？

首先，俞子夷主張教育应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他強調“教育是立国之基”，認為“要改造社会，必从改造个人入手”。他講这些話有两个作用：一是要教师为当时的反动政府服务；一是阻止人民直接参加革命斗争。他又大力提倡“政教分工合作”，認為这是一个“合理的办法”。我們知道这里所指的“政”，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罪惡勾当；所謂“政教分工合作”，就是要广大教师去作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兇。他还在“教师之友”杂志上写了一篇“教書匠和方法”的文章，把教师称作教書匠，公开宣傳教書匠是工具，專供社会国家的驅策，鼓动教师盲目服从国民党反动政府。他还別出心裁地說：“目标弄錯，教書匠不負責任；方法不好，却是我們的責任。”又說：“一个定方案政策，一个想最好的方法使实现，彼此分工，結果就是合作。要是調了一个头，專用方法的工匠，对于政策目标，也要妄

參末議……結果弄得兩不討好，或者一无成就。”在這篇社論性的文章中，我們已不難看清俞子夷這副反動政府幫凶者的嘴臉。他竭力主張教師不必過問政策目標，只要盲目服從反動政府，做它的工具和幫凶就是了。

其次，俞子夷替國民黨反動政府辯護，并向他們獻策。

大家都知道，國民黨的教育工作是既反動又腐敗的。但俞子夷卻用摘錄威爾基“天下一家”這本書的辦法，大力宣揚國民黨教育的成績，來欺騙人民。他摘錄道：“中國農民和勞工的子女，在歷史上第一次得到一個求學的機會。”在另一篇教育雜文中，他又寫道：“民國成立以來，政治情形是混亂的，可是教育方面卻尚有差強人意處。”他明知國民黨教育腐敗，難以掩飾，於是又設法為之辯解，他說：“我常想，即使我做了縣長，也未必能做得比現在的好多少。”他認為主要原因是客觀上存在困難：“兵和糧兩事已經足夠使全縣政府中人日夜忙得焦頭爛額，還有多少功夫可以用在所謂百年樹人的大計！”

可以看出，俞子夷對國民黨反動政府是採取先肯定成績的辦法，然後為缺點找難以避免的原因，態度是如此的“冷靜”，如此的“客觀”！但是，他對我們的黨和政府的工作，卻相反地捏造事實、顛倒黑白、惡意攻擊。兩相比較，說明了什麼，難道還不清楚嗎？

不僅如此，俞子夷還把不合理的舊社會制度所暴露出來的問題，輕描淡寫，說成是教育工作上的缺點，企圖以此迷惑人民，維護反動統治。例如，在“學用問題”一文中，他對當時“大學畢業即失業”這一社會問題作了分析，但是在整篇文章中找不到一句責備反動政府的話。他認為造成“畢業即失業”

這個問題的主要原因是，青年們沒有在學校里學到一些社會上所需要的職業知識和技能，於是大講特講該如何改變教育方法。這篇文章是實用主義的典型，同時也是在替反動政府開脫罪責，其中有着明顯的反動的政治目的。

為了抬高美國，抬高自己，希望反動政府更加重視他所販賣的**設計教學法**，他便在“教法”一文中吹噓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確是30幾年來教育的功效，是推行實用主義教育和**設計教學法**的結果”。這顯然是非常幼稚可笑的。誰都知道，反法西斯戰爭的主力是蘇聯，戰爭的勝利首先是由於蘇聯紅軍和蘇聯人民的努力。難道蘇聯也是由於推行了實用主義教育、**設計教學法**，才獲得戰爭的勝利嗎？事實恰恰和俞子夷所說的相反。

在教育工作方面，俞子夷向反動政府提出很多建議。他提出：“無論那一方面都需要改進，都缺少有力分子。”認為“教育界許多有力分子”去當官是一種進步，要求這些“有力分子”加強對教育工作的領導。為了糾正“政教合一”的毛病，他提議“政教分工合作”。當時國民黨反動政府為了研究他的獻策，常常召他去南京，他也以此為榮，並在人前夸耀自己。

再次，俞子夷大力提倡“心理建設”。他在著作中，一再要求加強“心理建設”。他所大聲疾呼的“心理建設”究竟是什麼樣的东西呢？

應當指出，解放以前，由於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大敵人的血腥統治，我國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當時最重要的任務是要把全國人民動員起來，推翻三大敵人，建立革命政權。然而俞子夷所主張的“心理建設”却是實行奴化

教育。例如，他要学生自制，不鬧風潮。他說：“教育是教人自制的。”“我們教育學生，希望他們自制的力量與年俱進。發生風潮，這一點便暴露了我們平時教育的缺點”（以上均見“怎樣做教師”）。他很怕學生鬧風潮，搞革命活動，把萬惡的反動統治推翻。他又竭力主張教師應作反動統治階級的工具，並要我國人民接受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和文化侵略等。這一切都可證明他所大力提倡的“心理建設”，實際上就是實行奴化教育。

最後，我們再看當時他在培養教師的工作上如何進行反共、反人民的教育活動。他在“怎樣做教師”這本書的自序中，夸耀自己20多年來“教出了好多好教師”。

什麼是他所說的好教師呢？他的標準不是別的，首先就是要忠誠地為反動政府服務。例如，他在“一個鄉村小學教員的日記”這本書中所着力描寫的“楊先生”，就是一個對反動政府百依百順的人。這本書一開頭即特別提出“楊先生”在生活待遇問題上從來不和政府計較。他的目的顯然是要教師聽憑反動政府的壓迫和剝削。在“怎樣做教師”這本書里，俞子夷非常重視對付學生風潮的能力的訓練，並且設法培養教師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光榮感”和“責任感”。在“教書匠和方法”一文中，公開號召教師作反動政府的工具。所有這些，就是他所謂好教師的標準。幾十年來，在他所進行的培養教師的工作中，真不知毒害了多少青年！

以上四方面的材料充分地告訴我們，俞子夷在解放前的教育活動完全是以鞏固反動統治為目的，和他在解放後的反動言行是一脈相承的。

(三)他的教学理論是伪科学的

俞子夷所身体力行的教学理論和教学方法，仔細分析起来，不过是杜威实用主义的翻版，并没有什么新鮮和独创的东西。

第一、把教育当做“立国之基”，“改造社会”的手段，并且認為教育是解决国际爭端的“唯一方法”。这和杜威的“教育万能”的反动学說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贩卖杜威“天赋才能”的謬論，說什么“小孩子是人，所以他們本身是有力量的，这力量自己会得生長发达起来的。会向好的方面生長，也会向不好的方面生長。”因此，他認為教师“只須認識学生能力，鼓勵他們，帮助他們向正常的途徑发展就好了。”并且断定教育的作用不过是“因勢利导”而已。事实上，一个人的才能是一定的社会影响和教育影响所造成的，决不是天生的。坚持反动理論的人，也并不真正按自己的理論去做，相反地总是无时无刻不在設法培养自己的才能，以便加强反动統治。他們之所以要散播这种謬論，无非是要欺騙人民，說他們是天生有統治才能的人，劳动人民應該接受他們的奴役；說他們不过帮助兒童发展“天赋才能”，并没有根据統治階級的利益来进行反动教育，以掩盖教育的階級性。

第三、竭力推广設計教学法。他在“教学”这篇杂文中，主張学生应以“做一件于自己个人或公众团体有利益的事”为中心进行学习，主張廢止日課表，取消上課下課的信号，学生可以自由出入教室，教室应当視工作的需要决定布置的方式。并且認為“学生可以在工場里做工一整天，可以在外面參觀一整

天，也可以一部分人排演一个上午或下午”，不必进行有计划的、系统的学习。毫无疑问，实行这种方法的结果，就是取消正规的课堂教学、取消系统的科学知识的传授，以至最后取消学校。这种方法只能培养出具有某些适应周围环境的、凌乱的、狭隘的生活技能，便于忍受剥削和奴役的人。这是和我们的教育方针背道而驰的。

第四、在教学中片面强调实用和兴趣。他在“尝试与选择”一文中写道：“柯达公司教人学照相，百乐公司教人学无线电，他们的特点是目标明确，成败显著，工作的本身仿佛就是给听话的教师。课程教材以及公民训练等决非绝对不能组成按步渐进的设计单元，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若愿努力，必定可以把现在学校里死气沉沉的作业，变成学生废寝忘食，孜孜不肯释手的照相机和收音机。”这段话的目的是为了贩卖设计教学法。但是谁知道俞子夷竟在1957年5月27日，又把这段话搬出来，对参加编写农业基础知识课教材的教师讲，要大家用柯达公司和百乐公司的办法来引起学生对农业的兴趣。

当然，通过农业基础知识课的学习，培养学生对农业的兴趣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应该怎样引起学生对农业的兴趣呢？这里，我们和俞子夷有着根本的分歧。俞子夷认为只有采用柯达公司和百乐公司的办法，照样做出实用的东西来，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但我们认为要使学生对农业发生兴趣，首先应该使学生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所认识，对党所领导的农业合作化和农村生活美好光辉的前途有所认识。只有伟大的目的，才能产生伟大的力量，才能培养高尚的兴趣。至于柯达公司和百乐公司的办法，俞子夷的办法，充其量只能培养某些狭隘的

个人自私的兴趣。一个人的这种兴趣愈濃厚，对于社会主义就愈沒有用处。

此外，俞子夷还有“学校即社会”的謬論，还有一套害人匪浅的反动的測驗法等，不再在这里一一举例。

根据以上三部分材料，可以看出俞子夷是一个一貫反动的教育家，是杜威的忠实信徒。他那反动的政治立場和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与活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他对国内外反动派的忠誠，因而积极販賣实用主义的貨色。加之，由于他推行实用主义教育有功，受到美帝贊揚和反动政府獎賞，也就更加竭誠为反动統治階級服务，更加积极从事实用主义的教育活动，并且在解放后还繼續坚持几十年前的老路，抗拒改造。其实，这条老路在今天已是一条死路。俞子夷必須痛改前非，彻底交代，才有重新做人的机会。

（本文系根据民进省筹委会、教育厅、省教育工会联合整风座談会上，部分同志批駁俞子夷的发言材料写成。）

“插手”記

——揭露右派分子徐安貞

孫家宗

徐安貞是上海市第六十八中学的地理教师。当党开始整风以后，他突然变得非常活跃，特別忙碌，請人吃飯，到同事家登門造訪，他那肥大的腦袋，搖幌在主席台上，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地要大家“大鳴大放”。徐安貞为什么和往日不一样呢？是

的，他撕下了虛偽的面具，露出了右派分子的真面目。他借口“鳴放”，向党、向社會主義、向人民教育事業，進行了猖狂的進攻。

妄想推翻黨的領導

“鳴放”中徐安貞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樣，也將那染滿毒液的矛頭首先指向黨，妄想推翻黨對教育事業的領導。他說，解放以來在黨的領導下獲得重大成就的教育事業“辦糟了”。他露骨地說：“這樣的黨員校長怎么能領導學校呢？應該讓他下台。”為了實現讓共產黨下台的陰謀，他對學校里的黨組織展開了有步驟、有計劃的攻擊。首先，他採取了卑鄙的手段，想搞垮學校的黨組織。他對學校里的三個黨員運用了三套不同的辦法：打一個；拉一個；孤立一個。對打的對象就尽情地誣蔑，說他是“品質惡劣”，“吹牛拍馬向上爬，作風連國民黨還不如。”破壞他在羣眾中的威信，使他沒有發言權。對拉的對象就假作溫情地說：“支部對你很重視，為什麼上級常要他去開會而不叫你去呢？”企圖挑起對黨的不滿，達到他分化黨組織的目的。這樣，他便孤立了第三個黨員，再集中力量打下去。儘管他對黨員採取不同的手段，但基本態度是一樣，想要搞垮學校的黨組織。他說黨員抽牡丹牌香煙和穿西裝褲是“腐化墮落”；誣蔑學校的黨組織是“臭氣沖天的便桶”。

為了達到打擊黨的威信，推翻黨的領導的目的，徐安貞在丑化黨員的同時，還挑撥了黨和羣眾的關係，打擊擁護黨、熱愛人民教育事業的教師。他辱罵他們是“捧住臭便桶還不聞其臭的人”。他造謠說“黨不信任知識分子”。他誣指今天的工資

級別制度是把教師“分成十個等級，分成十種人，造成十道牆”。他說黨把教師培養成“一、看風頭行事、歌功頌德的人，二、唯唯諾諾、不聲不響的無用者，三、心裡有數、當面不講的落後分子”。他還哭喪著臉說自己是“被培養成一個消極分子了”。

黨把他“培養成消極分子”，那是瞎說；但是人民都相信，他的確是個消極分子。不僅對社會主義消極，而且反動。他對領導全國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共產黨露出了毒牙，表示了刻骨的仇恨。

人們要問：徐安貞這樣肆意向黨攻擊，他的目的是什麼呢？

徐安貞以民盟小組長的身份，在學校召開了一次全體教師大會，會上，他大大宣揚了一通民盟的“光榮歷史”之後，就像個拍賣商人那樣叫道：“我們民盟有辦法把學校办好，就是插不上手。”“我們盟的大門是開著的，歡迎各位參加。”他不知羞恥地為自己大吹大擂，妄想拼湊一支反黨的隊伍，篡奪領導權。他對教師杀气騰騰地說：“我們盟支持你們，你們也要支持盟。共產黨要報復，我們就一起來堅決和它鬥爭。”徐安貞這種挑撥黨和羣眾的關係，要黨“下台”和讓民盟來“插手”的反動陰謀，已經昭然若揭，暴露無遺了。

反對社會主義的教育制度

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徐安貞，是從根本上否定我們的教育制度的。他說“如今的教育制度不好。”“資本主義的雙軌制度就好，實行這種雙軌制度就不會存在升學問題的矛盾了。”他

所宣揚的那套“雙軌制度”，早在1952年他當私立正風中學教導主任的時候，就曾偷偷摸摸的實行過了。我們來看看他實行“雙軌制度”的情形吧，他在正風中學時擅自將清寒生40個折實單位的學費提高到95個折實單位，使大批勞動人民的子女不能入學。當時就有一個女同學找他談話，告訴他因付不起學費不能入學，要求減免。徐安貞對她講：“像你們這樣經濟困難的人，根本就不應該來讀書。”徐安貞是要恢復資本主義教育制度，要教育為資本主義效勞，他反對那些為社會創造財富的工人、農民以及一切勞動人民的子弟入學，他妄想將新社會拖回到資本主義的老路上去。

到處販賣資本主義雙軌制度、反對社會主義教育制度的徐安貞，在實際教學工作中，充分暴露了他的資本主義“經營”作風。他上課前不備課，到課堂信口開河地向學生解釋數學上的有理數與無理數為“有道理的數和無道理的數”，他批改學生作業時，閉着眼睛打記號。有個學生的作業中將美國的首都說成倫敦，他也批上個對的符號。他給學生的考試範圍可以從98題縮減到17題，說這是“突出中心”。他批分數是漫無標準的，可以從三分升到四分，從四分升到五分。他說這一切就叫做“人人都會教書，各有巧妙不同。”這些不是笑話，却是事實。徐安貞一貫用不負責、消極怠工和在教學工作中有意識造成的錯誤與偏差，來破壞教學工作，破壞社會主義的教育事業，然後再用這些來証實所謂“現在的教育制度不行”的反動論調，妄想使資本主義復辟的陰謀實現。

利用課堂販賣反共、反人民的私貨

右派分子徐安貞为了达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擇一切手段，竟喪尽天良，在課堂上向青年学生販賣私貨，散播毒素。他在課堂上所散播的反動言論，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他敵視我們新中國的建設，破壞我國人民的大團結。徐安貞講我國經濟地理的時候，以輕蔑的口吻對學生說：“第一個五年計劃實現了，我們每個人可以分到四斤棉花。”他重複又重複地說：“四斤！”在鋼鐵產量方面，他也以同樣的口吻說“不過如此”，而且還說美國是多少多少。此外，他還把我們的外交政策描畫成國主義，把我們的周總理描畫成封建帝王，他無中生有地說：“××國和我國通商，是因為××國的大使跪在周總理面前才成功的。”他還誣蔑和我國建立通商關係的國家“都是些無賴窮鬼”，言下之意，只有美國這樣富強的國家才不和我國通商。

徐安貞還在學生中間挑撥工人与農民之間的關係，他說：“以一年的總產值來說，工業比農業高許多倍，因此農民應該比工人少吃一些食油。”他造謠說：“李順達一年的產值是1000元，王崇倫就不可計量了。”這些不僅破壞了工農聯盟，而且對我們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是一個極為惡毒的破壞。

在少數民族問題上，他更表現得無恥，他別有用心地說：“少數民族非常骯髒，多少人合洗一盆水，就這盆髒水，結果還要喝下去，喝了可以消災延壽。”

在華僑問題上，他把僑胞都誣蔑為愚昧無知的人。他譏諷地說：“華僑很愛國，假如發生火災，他們什么都不要，只要三大國寶：馬桶、國旗和牌位。”這不僅侮辱了僑胞，而且是對所

有爱国者的侮辱。

徐安貞对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是敌視的，首先，他对社会主义陣营的堡壘——苏联大肆攻击，他对学生說：“苏联样样都好，就是輕工业不发达。”他誣蔑苏联的妇女是“穿着高跟鞋、搽了口紅在田里不干活的。”他說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原因是由于“盲目的学习苏联”和“匈牙利的領袖过急走社会主义道路，人民起来反对。”

可是徐安貞对美国怎么样呢？他用夸張的口吻夸耀美国的优越和豪华，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极力捧場。他說：“美国是一个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这主要的是他們社会制度的优越。”他說我們中国工业非常落后，連灯泡里的鎢絲也要到美国去加工，否則，“中国的电灯便不亮了！”他非常羡慕美国資本家有錢，他說：“有一个大財閥的兒子出外旅行，玩具多得連火車也裝不下，这些玩具連荣毅仁也买不起。”

徐安貞在課堂上，甚至喪心病狂地向青年学生鼓吹战争，他說：“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一个好处，因为男人們都战死在戰場，因此，德国的妇女社会地位提高了。妇女們要得到解放，只有战争。”失去人性的徐安貞，甚至向学生宣傳了馬尔薩斯的用战争来解决人口过多的反动言論，他說：“日本人侵略我們中国，是由于人口过多。”

右派分子徐安貞，是一个极为恶毒的人，他和人民有极深的不解之仇。他恨共产党，恨全国人民正在辛勤建設的社会主义事业，他仇恨今天的一切。今天是这样，过去也是这样。过去他为蒋介石效过劳，当过魚肉人民、无恶不作的国民党稅务局分局長，当过国民党軍校的中校政治教官和訓导主任，今天他

混在我們的教育工作者隊伍里，妄想推翻黨的領導，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破壞我國人民的大團結，破壞社會主義陣營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大團結。對於他，我們必須剝除他那件虛假的“二十年的老教師”的外衣，和他作一次徹底的、堅決的鬥爭。

徹底擊垮了以顧則夫為首的反動小集團

南通市實小 王玉明整理

我們南通市的小學教師和民辦中學的教師，在35天的集中整風、反右鬥爭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在這次反右鬥爭中，揭發了以市實小極右分子顧則夫為首的反動小集團。這個反動小集團的核心分子有右派分子嚴若愚、范澤等人，外圍分子有右派分子范德明、丁忠湛等人，從“主帥”“軍師”到“嘍羅”，成員共有十餘人。平時，他們相互勾結，狼狽為奸，散布反動言論，攻訐黨的政策，打擊黨團員和積極分子，阻撓學校各項工作的貫徹……罪行多端，不可勝數。整風學習開始後，他們陰險地採用了隱蔽戰術向黨進攻，狡猾地布置了退却，企圖瞞混過關。但是，他們的反動言行欲蓋彌彰，經過羣眾的檢舉、揭發和鬥爭，這個反動小集團，在強大的人民鐵掌的反擊之下，終於土崩瓦解了。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這個反動小集團的罪惡活動吧！

抓住一切機會，散布反動謬論

匈牙利事件發生後，顧則夫幸災樂禍地說：“匈牙利事件

真不簡單！”他还惡毒地把苏联出兵援助匈牙利和英法侵略埃及混为一談，并且希望匈牙利事件能夠发展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去年大鳴大放期間，全国的右派罪魁章伯鈞、罗隆基、儲安平提出了“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等謬論后，顧則夫大加喝采，极力附和。他对严若愚等人說：“成立政治設計院，民主党派可以輪流执政，这一来，共产党的領導权沒有了。”他还无中生有地說：“肃反中的确有人被冤枉了的，甚至被关了，被杀了。平反委员会真有意思，我認这意見很对。”“現在一切事都是共产党包办的，什么民主，都是共产党决定好了的。儲安平的‘党天下’提得不錯。”报纸上登載了浙江省整风反右取得了巨大胜利——揭发了沙文汉、楊思一等右派分子，顧則夫看到这則消息，就加以阴毒的詆蔑：“这是党内有不团结的現象，党内有宗派主义。”还說什么“高、饒是有才能的人，他們的反党也是党内宗派主义造成的”。把沙、楊、高、饒等人的罪惡不歸咎于他們自己，却一齐算在党的身上。看，极右分子顧則夫，对党的仇恨，对党的进攻，已到了何种瘋狂的程度！最近，市内广大干部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奔赴农业劳动战线，为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綱要40条，为建設新农村而奋斗。顧則夫却站在一边，对他們的小集团分子說：“參农的人大部分是假的，就是有好的去，也是做做样子的。”在他的影响下，小集团的成員，連工会发起的欢送上山下乡干部的大会，也沒有一人肯去。这个反动小集团，就是这样敌視和破坏党的中心运动。平时，顧則夫、严若愚、范澤在办公室里，經常散布煽动教师对党、对政府不滿的言論。教师們有的时候工作比較忙，顧就惡毒地說：“我們做教师的是劳动改造”，他还冷言冷語地进

行挑撥：“現在的教師是一支粉筆、兩袖清風、三餐不飽”，以此來形容教師的“苦”，完全抹煞解放後教師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的事實，企圖達到使教師跟黨疏遠跟小集團親近，從而發展到跟黨鬧對立跟小集團同流合污的罪惡目的。有一次，一對夫婦把東西打破了，表示捨不得，顧則夫乘機感嘆地說：“這點東西打壞了算什麼，我家那麼多房屋土地還被分掉了呢。”原來，顧則夫對他那罪惡的地主家庭在土改中受到應有的清算和懲罰一直懷恨在心，所以連人家夫婦間的一點生活小事也不肯放過，都要抓住借題發揮、吐泄毒氣。當然，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他更是狠狠地死也不肯放鬆了。

玩弄各種手法，丑化和攻擊黨團員；惡毒地攻擊領導，

企圖奪取學校的領導權

反動小集團的成員對黨團員一貫地仇恨入骨，把黨團員看作眼中釘。他們往往抓住黨團員的個別缺點，加以誇大，到處宣揚。罵黨團員是“靠牌子吃飯”“靠黨員賣錢”，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他們對執行匯報制度的黨團員尤其切齒痛恨，常常辱罵這些同志是“長舌婦人”。顧則夫曾對他小集團的成員說過：“現在，我們校里說話的人（指黨團員）變多了，他們要和你們為難，要致你們的死亡，不過沒關係，總有機會來報復的，就象打蛇要打七寸上一樣”。可見他們對黨團員是何等的仇恨，所用的手段是何等的毒辣了。他們對行政領導也極盡侮辱丑化的能事，罵鄒校長“沒有什麼了不起，和×校長相比，要給×校長吃了扁出來呢！”

阻撓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反对教育方針的貫徹,

摧殘劳动人民子弟的身体和心灵

反动小集团对学校行政所布置的工作处处阻撓。領導上布置工作后,小集团的“主帥”顧則夫馬上对小集团成員說:“做什么夢,不要睬他,不完成不要緊的。”当領導上发动全体教師注意經常全面地对学生貫徹劳动教育时,小集团成員不說自己反对,却含血噴人地誣蔑領導上是“理論一套,实际又是一套”,說什么“到了初中发榜时,校長的眼睛仁兒就落在榜上了,那时啃我們班主任的肉也沒有用啊!”他們对待劳动人民的子弟十分殘酷,好象紅了眼睛的瘋狗一般,罵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是畜牲,不是人养的,几年后要乱搞腐化”,是“豬八戒現原形,狐狸精拖尾巴”,是“一定要綁在杀豬凳上杀掉的”……穢言惡語,不胜枚举。他們不仅是罵,还經常体罰学生;刮鼻子,捏嘴巴,敲头,搗下頰。严若愚更毫无人性地用鋼笔尖戳学生的鼻子,当时鮮血直流,直到現在,这个孩子的鼻子上还留着一道伤痕。

爭取人,拉攏人,扩大反动勢力

顧則夫除了陸續糾合了严若愚、范澤等人为小集团的核心分子并拉攏了一些外圍分子外,还对全校所有的教師进行了分析研究,訂出了計劃,計劃中决定,坚持打击黨員王玉明、团员張子娛等同志,对其他教師則准备逐步拉入小集团,以扩大他們的反动勢力。顧則夫經常用請人吃吃喝喝,送送小礼等卑鄙方式,籠絡教師。他常夸耀过去的腐朽的資产階級生活方

式，引誘人走向庸俗墮落，不滿新社會的道路，他說：“我最喜歡二種東西——豬頭肉，燒酒”，“我的房間是以吃為中心，向廚房發展的方針。”小集團的人還常在一起說：“過去我們吃花生都是整畚箕的吃的，過去開油坊，油是整缸的吃的，雞肉都是整塊的捧在手里吃，牛腳斷了就整條的殺了吃”。他們留戀并宣揚剝削階級的生活。他們籠絡的對象，都是一些地主、資產階級分子或是歷史上有問題、仇恨黨的人。小集團的所有成員，臭味相投，攪在一起，所干的都是不可告人的勾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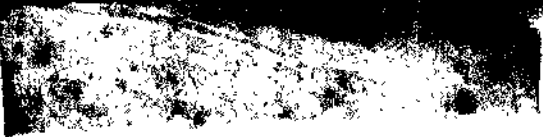
**隱蔽，進攻，退却，儘管他們用盡一切策略，
但都逃不出人民的巨掌**

開始集中進行整風時，他們都注意隱蔽自己，并相互照顧，怕暴露出反動小集團的真面目。剛寫大字報時，顧則夫對小集團成員說：“意見是要提的，提得太少反而不好，可以把那些不關緊要的問題大量鳴放出來。”他還指示小集團：“寫大字報時，要好好商量，內容要相互看看，并且集體出面。”一次，丁忠湛和顧則夫談到鳴放問題，顧就暗示丁說：“總之，我們不想在運動中立功就是了。”丁又問他：“我在整風中會不會做典型？”顧說“不過你不要爭取就是了。”意思是叫丁在鳴放中不要多說，不要暴露自己，就不會做典型。然而，儘管他們千方百計地隱蔽自己，但為反動本質所驅使，還是熬不住，仍然尋找機會向黨進攻。顧則夫指使小集團的人說：“你們要好好地把學校情況提一提，趁整風的時候把黨團員的工資拉下來，課務加加重，把黨團員打萎了，再把他們趕出去。”他并且指使小集團分子共同攻擊黨的基層組織，叫大家“對黨支部提意見，說

黨員不負責，工作拆爛污，要用大字報提”。當大辯論開始以後，他們估計到情況不妙，隨即布置退却。顧則夫對嚴若愚說：“如果問你，我們平時談些什麼問題，你就說我們談的是生活上的問題，工作上的問題。”他還一再叮囑嚴說：“如果有些問題談出來，不得了。”因此，當顧則夫被拉出來以後，小集團成員開始還守口如瓶，不肯揭發。但是，他們的罪惡活動怎能躲得掉呢？在黨的教導下，羣眾的覺悟提高了，眼睛也擦亮了，這個反動小集團的丑惡面目和陰謀詭計，再也騙不過人們的眼睛了。經過羣眾的檢舉、揭發和鬥爭，狠狠地反擊了這個小集團，徹底地粉碎了他們的陰謀。猖狂一時的小集團的成員，也不得不向人民低下頭來。這是我們南通市小教隊伍的偉大勝利，是我們黨的偉大勝利。

反動小集團是有它反動的階級根源、 社會根源、思想根源的

這個反動小集團為什麼會形成？小集團的成員（尤其是核心分子）為什麼對黨、對社會主義，抱着這樣深刻的仇恨？小集團為首分子和核心分子的來歷，給我們回答了這個問題。為首分子顧則夫，出身於反動地主家庭，其父是反革命分子，曾在日偽時期充清鄉公署經濟科長等職，解放後被人民政府逮捕，判刑15年，現在勞改。其叔父、堂兄、堂弟，均係反革命分子，有的被鎮壓，有的被判刑，有的已潛逃台灣。而他本人在解放初期還參加過特務組織“三青聯”的活動，因而他對黨有刻骨的仇恨。1954年9月，因他政治問題交代不清，撤去副教導主任職務，但仍派他續任小學教師。黨對他寬大處理了，但他却不



思悔改,反認為旧恨加新仇,因此來到突小以後,積極組織反動小集團,進行瘋狂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該集團核心分子之一、被羣眾稱為顧則夫的“軍師”的嚴若愚,與人民有殺父之仇,他在解放前參加過國民黨,後來一度在解放區當過教師,1946年又投敵自首。解放後,仍不痛改前非,生活腐化,工作極不負責,前後曾在兩個小學搞反動小集團活動。夠了!從這些人的來歷,已不難看出他們的反動本質,也不難理解他們為何如此惡毒地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破壞社會主義教育事業。